

汪曾祺与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ETARY  
PROSE OF WANG ZENGQI AND LIN  
YUTANG**

寇泽玉

**KOU ZEYU**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3**

汪曾祺与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ETARY  
PROSE OF WANG ZENGQI AND LIN  
YUTANG**

寇泽玉

**KOU ZEYU**

本论文乃获取中文系硕士学位（中华研究院）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January 2023**

## 摘要

林语堂与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位具有代表性的闲适作家，二者文学创作中都分布有数量、质量相当可观的饮食类散文。本论文以林语堂与汪曾祺的饮食散文为研究对象，从创作题材、艺术笔调、文化意蕴、饮食散文异同原因四方面对二者的饮食散文进行比较探讨。

第一章绪论部分通过对研究缘起、饮食散文及林语堂、汪曾祺散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介绍，阐明了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比较研究的空缺与本论文选题的可行性。

第二章从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的创作题材着手，用“过去记忆重建理论”解释了他们通过故乡及旅居地的饮食书写重返旧日时光的文学现象。分析了二人借饮食表达的不同人生哲思。

第三章从两者饮食散文的艺术笔调出发，论述了汪曾祺传承林语堂“性灵”、“闲适”观的具体表现。语言风格上二人各有千秋，林语堂的语言夸张通俗，汪曾祺行文朴素平淡。

第四章对两者饮食散文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分析比较。严谨的知识考据丰富了他们饮食散文的文化内涵。林语堂对中西饮食文化进行了对比及思索，汪曾祺则着重发掘中国民间文化蕴涵的人文、历史精神。

第五章结合两位作家的家庭背景及求学经历，探析了二人饮食散文书写异同的原因。

第六章是结语部分，对本论文进行了回顾和简要总结。

关键词：饮食散文；林语堂；汪曾祺；比较研究

## ABSTRACT

As two representative leisure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in Yutang and Wang Zengqi created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dietary prose in their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takes Lin Yutang and Wang Zengqi's dietary pro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ompare and discuss the two dietary prose from four aspects, which are creative theme, artistic style,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dietary prose.

The first chapter, the introduction, clarifies the status that there exists a gap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in Yutang and Wang Zengqi's dietary prose, also emphasiz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thesis by introducing the following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udy, the dietary pros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Lin Yutang and Wang Zengqi's prose.

The second chapter uses "theory of reconstruction of past memory" to explain the literary phenomenon of returning to the old day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iet writing about their hometown and sojourn from the point where creation themes of Lin Yutang and Wang Zengqi's prose on diet starts, as well as analyzes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es of life expressed by the two through their diet.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Wang Zengqi's inheritance of Lin Yutang's "spiritual" and "leisure" views from the artistic style of the two dietary prose. In terms of language style, the two have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respectively. Lin Yutang's language is exaggerated and popular, while Wang Zengqi's prose is simple and plain.

The fourth chapt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two dietary prose. Rigorous knowledge research has enrich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ir dietary prose. Lin Yutang made a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on Chinese and Western food culture, while Wang Zengqi focused on exploring the humanistic and historical spirit contained in Chinese folk culture.

The fifth chapt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writers' dietary prose writing based on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and study experience of the two writers.

The six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part, which reviews and briefly summarizes the thesis.

Key words: dietary prose; Lin Yutang; Wang Zengqi; comparative study

## 致谢

时光荏苒，转眼硕士生涯即将画上句号。回顾疫情下异国他乡的这段求学之路，虽几经坎坷，但收获良多。2020年初始料未及的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在马来西亚经历了漫长的 MCO 后，我通过了雅思考试并进入到正式课程的学习。那些独自一人出门采购生活物品、因状况频出而紧张失眠、在深夜做功课看文献的点点滴滴仿若昨天才刚发生，但恍然间发觉，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

对本人来讲，创作论文的过程是一段修心的旅程。随着论文书写的推进，我从开始的劲头十足到自我否定、自我怀疑，再到认真修改、静心沉淀。林语堂与汪曾祺两位先生的饮食散文带给了我一些人生启迪，他们文字中传达的哲理使我有面对繁杂生活的勇气与力量。我感慨于文学世界的宏大与自己学识的狭隘，在未来也会怀着谦虚诚挚的态度继续我的学术梦想。

感谢我的导师廖冰凌副教授，从论文的开题到正稿的完成，廖老师给予了我耐心的帮助与点拨，一次次的细致批阅，一次次的中肯建议……学生难以忘怀长达两小时 MT 会议中您一字一句与我核对论文的场景。在您的指导下，我的学术思维得以开阔，也领会到学术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您严谨治学的学术精神值得我毕生学习，能够做廖老师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其次，我还要对研究生院的其他老师们表达谢意。郑文泉老师给了我许多学业上的建议与指点，叶佩诗老师告诉我人生永远有无限可能，刘海莲老师赋予了我初次做活动司仪的体验……老师们平易近人又具学者风范。感谢我的朋友们，在马来西亚一起学习、一起吃饭的日子将是我人生中一段珍贵的回忆。我还要感谢我的博士学姐们，谢谢她们在我倍感焦虑的时候倾听我的烦恼，真诚、殷切的给我宽慰。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谢谢你们理解我、包容我、鼓励我，谢谢你们愿意做坚强的堡垒一直庇佑我，谢谢你们给予的物质帮助与精神支持。爸爸讲他没有梦想，我的梦想就是他的梦想，所以我私以为这个硕士学位也是属于爸爸妈妈的。感恩！

论文完成了，但这绝不是结束，这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ETARY PROSE OF WANG ZENGQI AND LIN YUTANG 汪曾祺与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比较研究”为寇泽玉亲自撰写，是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Liau PL*

日期: 19/01/2023

---

(廖冰凌副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日期：2023 年 01 月 19 日

##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书

此证寇泽玉（学号：20ULM04237）在中华研究院廖冰凌副教授指导之下，已完成此一题为汪曾祺与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比较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

（寇泽玉）

## 论文声明

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寇泽玉

学号：20ULM04237

日期：19/01/2023

## 目录

	页数
摘要 .....	ii
ABSTRACT .....	iii
致谢 .....	v
论文核实书 .....	vii
硕士论文提交书 .....	viii
论文声明 .....	ix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11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问题 .....	20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22
第二章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的创作题材比较 .....	26
第一节 对故乡及旅居地饮食的怀旧书写 .....	26
第二节 饮食书写下不同的人生哲思 .....	33
第三章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的艺术笔调比较 .....	38
第一节 一脉相承的“性灵”与“闲适” .....	25
第二节 “恣肆通俗”与“平淡简练”的语言风格 .....	45
第四章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的文化意蕴比较 .....	50
第一节 严谨的知识考据 .....	50
第二节 中西饮食文化对比与民间饮食文化的书写 .....	54
第五章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异同的原因 .....	60
第一节 和谐家庭氛围的浸染 .....	60
第二节 心驰自然的文学根植 .....	65
第三节 中西结合式教育与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 .....	67
第六章 结语 .....	71
参考文献 .....	74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饮食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与我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人类进行一切身体活动的基础。中国的饮食发展从远古时代的茹毛饮血进化到现在的饕餮盛宴，从对于食物仅食可果腹的要求进化到现在的色香味俱全，饮食追求的变化映射的是文明与文化的进步。最初中国古代记录饮食的目的大多是出于食谱、礼仪、祭祀等的需要，如南北朝余姚人虞惊的《食珍录》<sup>1</sup>记录了自魏晋朝代以来当时鼎盛望族的山珍佳肴食谱，明代时期韩奕书写的《易牙遗意》<sup>2</sup>记载了十二类、多达一百五十多种食材的烹饪秘诀，清朝时期朱彝尊著写的养生类饮食书籍《食宪鸿秘》<sup>3</sup>等，都是关于饮食的古文篇章与专著。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时间与社会的流逝更替，饮食被赋予了更多微妙的寓意与内涵。食物在这时候已经不单只是一种满足人们机体的物质，更成为了人们寄托情思、展现文思的一种载体。很多作家墨客都喜欢将饮食带入他们的文章中或是作为书写的主体，如现代作家周作人、林语堂，当代作家汪曾祺、陆文夫等，这些作家都是在中国文坛上颇有名气的“饮食”作家，在这些大家的笔下，那些简简单单的食物盈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文化内涵。

在上述提到的诸多作家中，有两位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那就是林语堂与汪曾祺。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学者、翻译家。是《论语》、《人间世》（半月刊）、《宇宙风》杂志的创刊者。“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他最为人知晓的一个标签，他用自己的书写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

---

<sup>1</sup> [宋] 浦江吴氏、陈达叟，〈食珍录〉，《吴氏中馈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页 69。

<sup>2</sup> [元] 韩奕著、邱庞同注释，《易牙遗意》，（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

<sup>3</sup> [清] 朱彝尊，《食宪鸿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与思想<sup>4</sup>。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县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sup>5</sup>。汪曾祺是当代文坛的英杰之一，他的散文笔墨淡然，文风古朴，在书写中擅长将生活提高到艺术层面。

分属于不同时代的林语堂与汪曾祺，创作了一些具有个人鲜明特色但又存在关联性的饮食作品。目前，学界对于汪曾祺饮食散文的研究较多，但多为期刊小作，也有一些对其进行专项论文研究，但数量上寥寥无几。关于林语堂的散文研究，学界多集中在分析其文风与审美观上，对其饮食散文的分析研究屈指可数，更无全面细致的长篇研究，且在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的比较分析层面上，经查证学界目前无人进行探索与查究。故本研究想从此立意点出发，对二者的饮食散文进行对比探究。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 饮食散文研究综述

关于饮食散文的研究，郑淑娟在《台湾饮食散文研究》中为饮食散文加上了限定词，即“想象的文字”<sup>6</sup>。钟怡雯〈记忆的舌头—美食在台湾散文的出没方式〉一文中也强调了优秀的饮食散文能使读者进入到除舌尖外的世界，体会到更多的言外之意，而不是仅局限在文字当中<sup>7</sup>。研究界主要围绕饮食散文的三方面展开，分别是饮食散文整体研究、饮食散文特定视角研究、具体作家饮食散文解读，在这些研究中也会对饮食散文的定义进行渗透。

---

<sup>4</sup> 黄万华，〈第八章 国统区文学 第六节 林语堂、梁实秋的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页 289-299。

<sup>5</sup>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 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页 107。

<sup>6</sup> 郑淑娟，《台湾饮食散文研究》（台北：私立佛光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页 11。

<sup>7</sup> 钟怡雯，〈记忆的舌头—美食在台湾散文的出没方式〉，《雄辩风景：当代散文论 I》（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页 238。

## （一）饮食散文整体研究

《饮饌之美—二十世纪中国饮食文学研究》将研究视野聚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饮食书写，理论方面对二十世纪中国饮食文学的文化意蕴进行了解读，个案研究方面对周作人、唐鲁孙、汪曾祺、沈宏非、艾俏五位作家的饮食文学作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全面梳理了中国饮食文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过程<sup>8</sup>。

## （二）饮食散文特定视角研究

### 1. 区域性饮食文化

于祎〈“馋”：饮食散文随笔中的北京文化之真性情〉一文以“馋”字作为整篇研究的引子，从饮食散文第一人唐鲁孙的“馋”、北京官家子弟王世襄因为口腹之欲写下的《鲙鱼宴》、赵珩《老饕漫笔》等、梁实秋饮食散文中代表平民阶级的民间小食三方面对北京食文化进行了分析<sup>9</sup>。余思亮从身份认同与乡土情结两方面对李烈声〈虾酱之恋〉、吴淑钿〈古早味之乐〉、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等澳门作家创作的饮食散文进行了研析，得出了“无论身在何处，家乡饮食的味道是刻在骨血中”的结论<sup>10</sup>。

### 2. 特定食物视角

王梦石从作家茶散文、学者茶散文、茶人散文、赋体茶散文四方面对当代茶散文的作家及作品进行了研究分析<sup>11</sup>；倪阳对鲁迅散文中的“酒”意象进行了多重解读，得出了“酒”对于缓解鲁迅的空间焦虑有着重要作用之结论<sup>12</sup>；朱希祥对朱自清散文中的

---

<sup>8</sup> 李友云，《饮饌之美—二十世纪中国饮食文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美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页III—10。

<sup>9</sup> 于祎，〈“馋”：饮食散文随笔中的北京文化之真性情〉，《大众文艺》2016年24期，页26—27。

<sup>10</sup> 余思亮，〈激发文字里的味蕾：澳门美食散文的身份认同与乡土情结〉，《新阅读》2020年11期，页73—74。

<sup>11</sup> 王梦石，〈当代茶散文创作谈〉，《农业考古》2008年02期，页213—221。

<sup>12</sup> 倪阳，《继承与重构：论鲁迅作品中的酒》（安徽：安徽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6）。

“橘子”“扬州菜”“豆腐”等意象代表的饮食文化进行了细致阐释<sup>13</sup>。此外还有部分以其他食物为主题的散文研究在这里不做一一赘述。

### （三）具体作家饮食散文研究

#### 1. 具体作家饮食散文的整体研究

于帆的《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从梁实秋饮食散文的特点（风格、文化内涵、审美）、创作饮食散文的原因（乡愁、生活经历、亲友欢聚之乐）、饮食散文的价值三方面进行研究<sup>14</sup>。钟瑾把沈宏非饮食散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饮食散文的成因及其散文中的典型食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饮食散文的独特个性及价值进行了探讨。

#### 2. 具体作家饮食散文文化意蕴

许泽盼指出，琦君饮食散文承载着其怀乡念亲的情思，其描写的不同的传统节日习俗里的食物也具有不同的寓意，饮食书写中还传达了人生哲理<sup>15</sup>。〈丰子恺散文中的饮食文化探析〉一研究中对丰子恺饮食散文中涉及的日常食俗、节日食俗、祭祀食俗等进行了探讨，并对其饮食书写中的这些食俗进行了溯源（故乡情结、佛家思想）分析<sup>16</sup>。

## 二 林语堂散文研究综述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学界对林语堂的研究，1979年以前多从鲁迅、胡风等左翼作家对林文章的政治印象批判方面着手，这是林语堂研究的开始。1985年后学界对于林语堂的研究才逐渐步入客观理性

---

<sup>13</sup> 朱希祥，〈“橘子”、“扬州菜”及其它——朱自清散文中的饮食文化〉，《食品与生活》1999年02期，页22-24。

<sup>14</sup> 于帆，《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页I。

<sup>15</sup> 钟瑾，《论沈宏非散文的饮食书写》（广西：南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页I—II。

<sup>16</sup> 贾晓珉，〈丰子恺散文中的饮食文化探析〉，《长江丛刊》2016年12期，页38—39。

思考阶段，90年代至今是林语堂研究的繁盛时期，学界对于林语堂的作品研究多在散文、小说翻译传记等方面，但最集中的还是对林语堂散文的探讨，这跟其散文取得的成就有关。

林语堂散文的研究的热点主要在三方面，一是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性灵”文学观念；二是林语堂散文的文学价值；三是林语堂的比较研究。学界对于林语堂饮食散文的专题研究较为稀少，但也有极个别学者就此进行了简要分析。

林语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倡导幽默闲适轻松的文学观引起了当时很多学者的批评，后世对于这种文风进行了许多研究。本人分析了不少研究发现诸多研究者在分析林语堂幽默文学观念总将其与闲适观、性灵观联系在一起，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杜江晖的〈林语堂散文幽默观初探〉提出，林语堂的散文辛辣且尖锐揭露了一些社会问题，促进了当时散文的发展。但同时因背离了当时时代的审美而具有部分局限性<sup>17</sup>。但也有学者对其文学观是否脱离社会持不同看法，张宇菊在分析林语堂散文的幽默风格指出，林语堂的幽默来源于林的童年生活以及对东西方文化的吸收。她认为林的幽默，在把握与时代的距离上处理恰当，在散文功用上也是文美兼具社会批判<sup>18</sup>。陈秀珍称林语堂散文的幽默具备三方面要素，分别是从容面对人生跌宕、快乐与悲伤照单全收、文章节奏要一气呵成。同时还指出林语堂的散文是融汇了东西方特色的散文<sup>19</sup>。

关于林语堂散文的价值研究，苏静、赵苗在〈试论林语堂散文的当代文化价值〉称林语堂促进了东西方散文的交流与学习，林语堂的散文把中国的人文主义展示给世界欣赏<sup>20</sup>。张洁〈另一种角度的思辨——林语堂散文解读〉从不同角度对林语堂散文的

---

<sup>17</sup> 杜江晖，〈林语堂散文幽默观初探〉，《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5期，页114。

<sup>18</sup> 张宇菊，〈论林语堂散文的幽默风格〉，《青春岁月》2017年26期，页30。

<sup>19</sup> 陈秀珍，〈寓庄于谐独具闲趣——林语堂散文的幽默〉，《武夷学院学报》2010年6期，页57。

<sup>20</sup> 苏静、赵苗，〈试论林语堂散文的当代文化价值〉，《文教资料》2017年27期，页50。



意义价值进行了解读，一方面认为林散文的闲适风格与当时的动乱年代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又提出林语堂求“真”的散文对于当时散文界充溢的激进文风是一种缓和与补充<sup>21</sup>。此外还有一些冷门的价值研究，如从语用角度切入研究林散文的修辞价值等。对于林语堂散文的比较研究也是学界关研究的一个热点。探研最多的是梁实秋与林语堂散文的比较。雷琰、范厚权〈浪漫与古典——林语堂、梁实秋文艺观之比较〉从文艺思想角度入手分析了林语堂与的散文特色，得出林语堂的散文幽默不受格式拘束，梁实秋的散文古典又有分寸<sup>22</sup>。贺美锋则是比较了梁实秋与林语堂散文的异同点，相同处包括作品中都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及诙谐的特点，不同处则主要体现在审美观、词句风格两方面<sup>23</sup>。此外还有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的一些比较研究，此处不做太多延伸。值得一提的是吴周文、张王飞的〈汪曾祺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sup>24</sup>，学界对于汪曾祺与林语堂的比较研究稀少，此文指出汪文对于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在当代文学史产生了重要意义，此文可作为研究汪曾祺与林语堂饮食散文比较的一个突破口。

有关林语堂饮食散文的专题研究目前所知的仅有蒋含璐、陈佳佳所写的〈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文化解读〉、朱希祥〈食品—人生意义的表现与折射—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上）〉、〈中西比较：自然—文化—政治—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下）〉三篇。蒋、陈之作篇幅简短，简单的分析了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批判意义及作品中烟、酒、茶的文化内涵<sup>25</sup>。朱希祥的两篇研究，上篇从林语堂饮食散文中饮食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林语堂饮食文化将饮食与民生、政治等结合来展开研

---

<sup>21</sup> 张洁，〈另一种角度的思辨——林语堂散文解读〉，《镇江高专学报》2012年3期，页29。

<sup>22</sup> 雷琰、范厚权，〈浪漫与古典——林语堂、梁实秋文艺观之比较〉，《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4期。

<sup>23</sup> 贺美锋，〈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散文特点比较〉，《青年文学家》2013年4期，页43。

<sup>24</sup> 吴周文、张王飞，〈汪曾祺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江苏社会学科》2014年2期，页171。

<sup>25</sup> 蒋含璐、陈佳佳，〈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文化解读〉《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究<sup>26</sup>，下篇从自然、文化、政治三个角度对林语堂饮食散文中涉及的中西文化比较进行探讨<sup>27</sup>。

### 三 汪曾祺散文研究综述

学界研究汪曾祺，初期的主要对象是汪曾祺的小说，90年代至今是研究的扩大阶段，随着汪曾祺散文研究的逐步发展，这时期诸多学者对于汪曾祺的思想理念也颇感兴趣。众所周知，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点，但学界对于汪曾祺的散文研究却没有小说研究那样繁多，所以直到现今关于汪曾祺的散文研究都没有很全面。针对汪曾祺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题材类型、文化内涵、创作渊源以及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至于汪曾祺饮食散文的研究，学界已有多人进行了探索。

研究界在探讨汪曾祺散文的题材类型时将其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人物散文、游记散文与饮食散文。

阮崇友在〈试析汪曾祺散文的题材特色〉中将汪曾祺的人物散文又细分为自传性散文、师友散文，同时也提到其游记散文集山水景物与历史人物、民俗风土于一身。王艳蕾研究指出汪曾祺的散文无论是游记类，还是饮食类与人物类，都处处可窥汪曾祺学者式的人道主义情怀<sup>28</sup>。卞永清则从平民化角度出发，提出自己对汪老不同类型散文的理解，饮食散文追求的是人间烟火与平民趣味，以师长为主题的人物散文体现了汪老对前辈的敬重与感激，游记散文里有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sup>29</sup>。此外学界对于这

---

<sup>26</sup> 朱希祥，〈食品—人生意义的表现与折射—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上）〉，《食品与生活》1997年第1期。

<sup>27</sup> 朱希祥，〈中西比较：自然—文化—政治—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下）〉，《食品与生活》1997年第2期。

<sup>28</sup> 王艳蕾，〈昭显生活 随性灵动——汪曾祺散文创作论〉，《湖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页121。

<sup>29</sup> 卞永清，〈平民化的汪曾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期，页82-85。

三种题材散文的单独研究也颇多，例如任娜〈浅析汪曾祺的记人散文〉、陈思《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等。

汪曾祺散文的文化内涵也是学界着重研究点之一。诸多学者在进行汪散文研究时都会对其文化意蕴进行一些探讨扩展。柯玲在〈汪曾祺特色的文化性解读〉中提出一个别有趣味的词“水性”，她认为水性是汪曾祺创作的特色文化底蕴之一，并在散文方面表现尤为突出<sup>30</sup>。李婧竹用淡、润、净、雅四词来概括汪散文的审美意蕴。

关于汪曾祺散文的艺术特色，既有对于其审美美学、语言结构的专项研究，也有散文整体的综合研究。黄科安在〈“边缘化”与闲适之文——论汪曾祺散文的审美艺术〉中指出“闲”“静”“淡”“趣”构成了汪散文艺术的独特价值<sup>31</sup>。鲁晓霞在〈汪曾祺散文的艺术个性〉中认为汪曾祺的散文在文体特征、审美、结构与语言四方面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sup>32</sup>。

对于汪散文的创作渊源，学界大都将其归结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黄科安就指出汪曾祺身上不止有儒家的影响，还有道家文化的浸润，儒道互补才使汪散文达到了充实与空灵的境界。但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郑晓玲在〈论儒道精神对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汪在散文创作中巧妙避开老庄哲学中的消极部分与儒家对于礼法的严苛要求，将书写重点转向尊重人的意志自由发展，使传统儒道现代化、生活化<sup>33</sup>。周荷初〈汪曾祺散文创作管窥〉认为其散文扬长避短式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传统<sup>34</sup>。

---

<sup>30</sup> 柯玲，〈汪曾祺特色的文化性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2期，页178。

<sup>31</sup> 黄科安，〈“边缘化”与闲适之文——论汪曾祺散文的审美艺术〉，《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3期，页49。

<sup>32</sup> 鲁晓霞，〈汪曾祺散文的艺术个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期，页70-72。

<sup>33</sup> 郑晓玲，〈论儒道精神对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影响〉，《大众文艺》2019年7期，页42。

<sup>34</sup> 周荷初，〈汪曾祺散文创作管窥〉，《当代文坛》1993年4期，页28-30。

在对汪曾祺散文研究的过程中，很多学者运用了比较方法来进行研讨。学界对汪散文最常见的就是将汪曾祺与其恩师沈从文的散文进行比较。潘秀芹《沈从文、汪曾祺散文比较研究》从时代、个人经历、散文功用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沈文矛盾的忧愁感与汪文古朴的超脱有内在联系又不同发展，最终得出二人同中有异观点<sup>35</sup>。如林奕伽将汪曾祺与周作人的饮食散文进行比较，但只是简单陈述双方文章，并未从深层次挖掘文章的异同点及原因。总体来说，对于汪曾祺散文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还有待进一步的扩展。

虽然汪曾祺饮食散文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多为短篇小制，且大都是从文化内蕴来进行佐论。高慧雯在〈论传统饮食文化与汪曾祺散文的关联〉一文里指出汪曾祺将传统饮食作为一个主要的文学书写对象，其目的—是丰富文学的表达形式，二是借饮食传达自己的情绪与文学追求<sup>36</sup>。张雨凡〈饮食与人生的深层互动—评汪曾祺饮食散文〉中认为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将其对人生、对文化的想法通过饮食这一媒介表达出来，为现代人们提供精神指导<sup>37</sup>。学界唯一对汪曾祺饮食散文有较长篇幅解释的陈思的《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是从四个部分—饮食文化意蕴、京派传承与个人特色、饮食情结原因、价值与局限来进行分析的<sup>38</sup>。此篇研究在文化意蕴方面对于笔者的研究主题会有一些帮助，但总体来说本研究较之要更为广泛，研究过程中还将涉及到艺术笔调与创作者生活经历等方面的比较，也会在细节处进行更多的强化。

以上就是林语堂与汪曾祺散文的研究综述，通过整理可得出以下结论：一、学界对于林语堂的研究主要是从其文学观与其散文价值和比较方面进行探讨，学界对于汪

---

<sup>35</sup> 潘秀芹，《沈从文、汪曾祺散文比较研究》，（中国山东：山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论文，2009），页1。

<sup>36</sup> 高慧雯，〈论传统饮食文化与汪曾祺散文的关联〉，《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6月第18卷第2期。

<sup>37</sup> 张雨凡，〈饮食与人生的深层互动—评汪曾祺饮食散文〉，《新纪实》2021年第33期。

<sup>38</sup> 陈思，《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中国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论文，2017），页1。

曾祺散文的研究是从题材、创作缘由、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进行探究；二、学界对于二者的饮食散文研究皆未成严整系统，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的数量远胜于林语堂饮食散文研究，目前已知林语堂饮食散文研究仅3篇，同时也发现研究界从未对二人的饮食散文进行过比较研究。学界较长篇幅研究汪曾祺饮食散文的是陕西师范大学陈思的硕士论文《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从文化意蕴、京派传承与个人特色、创作缘由、价值局限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在介绍京派传承与艺术特色方面陈思认为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在题材上、审美上与周作人和梁实秋具有一致性，个人特色则以口语化较短篇幅一笔带过。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 饮食散文研究综述

关于饮食散文的研究，郑淑娟在《台湾饮食散文研究》中为饮食散文加上了限定词，即“想象的文字”<sup>39</sup>。钟怡雯〈记忆的舌头—美食在台湾散文的出没方式〉一文中也强调了优秀的饮食散文能使读者进入到除舌尖外的世界，体会到更多的言外之意，而不是仅局限在文字当中<sup>40</sup>。研究界主要围绕饮食散文的三方面展开，分别是饮食散文整体研究、饮食散文特定视角研究、具体作家饮食散文解读，在这些研究中也会对饮食散文的定义进行渗透。

#### （一）饮食散文整体研究

《饮馔之美—二十世纪中国饮食文学研究》将研究视野聚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饮食书写，理论方面对二十世纪中国饮食文学的文化意蕴进行了解读，个案研究方面对周作人、唐鲁孙、汪曾祺、沈宏非、刁俏五位作家的饮食文学作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全面梳理了中国饮食文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过程<sup>41</sup>。

#### （二）饮食散文特定视角研究

##### 1. 区域性饮食文化

于祎〈“馋”：饮食散文随笔中的北京文化之真性情〉一文以“馋”字作为整篇研究的引子，从饮食散文第一人唐鲁孙的“馋”、北京官家子弟王世襄因为口腹之欲写下的《鳜鱼宴》、赵珩《老饕漫笔》等、梁实秋饮食散文中代表平民阶级的民间小食三方面对北京食文化进行了分析<sup>42</sup>。余思亮从身份认同与乡土情结两方面对李烈声

<sup>39</sup> 郑淑娟，《台湾饮食散文研究》（台北：私立佛光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页11。

<sup>40</sup> 钟怡雯，〈记忆的舌头—美食在台湾散文的出没方式〉，《雄辩风景：当代散文论I》（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页238。

<sup>41</sup> 李友云，《饮馔之美—二十世纪中国饮食文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美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页III—10。

<sup>42</sup> 于祎，〈“馋”：饮食散文随笔中的北京文化之真性情〉，《大众文艺》2016年24期，页26-27。

〈虾酱之恋〉、吴淑钿〈古早味之乐〉、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等澳门作家创作的饮食散文进行了研析，得出了“无论身在何处，家乡饮食的味道是刻在骨血中”的结论<sup>43</sup>。

## 2. 特定食物视角

王梦石从作家茶散文、学者茶散文、茶人散文、赋体茶散文四方面对当代茶散文的作家及作品进行了研究分析<sup>44</sup>；倪阳对鲁迅散文中的“酒”意象进行了多重解读，得出了“酒”对于缓解鲁迅的空间焦虑有着重要作用之结论<sup>45</sup>；朱希祥对朱自清散文中的“橘子”“扬州菜”“豆腐”等意象代表的饮食文化进行了细致阐释<sup>46</sup>。此外还有部分以其他食物为主题的散文研究在这里不做一一赘述。

### （三）具体作家饮食散文研究

#### 1. 具体作家饮食散文的整体研究

于帆的《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从梁实秋饮食散文的特点（风格、文化内涵、审美）、创作饮食散文的原因（乡愁、生活经历、亲友欢聚之乐）、饮食散文的价值三方面进行研究<sup>47</sup>。钟瑾把沈宏非饮食散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饮食散文的成因及其散文中的典型食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饮食散文的独特个性及价值进行了探讨。

#### 2. 具体作家饮食散文文化意蕴

---

<sup>43</sup> 余思亮，〈激发文字里的味蕾：澳门美食散文的身份认同与乡土情结〉，《新阅读》2020年11期，页73—74。

<sup>44</sup> 王梦石，〈当代茶散文创作谈〉，《农业考古》2008年02期，页213—221。

<sup>45</sup> 倪阳，《继承与重构：论鲁迅作品中的酒》（安徽：安徽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6）。

<sup>46</sup> 朱希祥，〈“橘子”、“扬州菜”及其它——朱自清散文中的饮食文化〉，《食品与生活》1999年02期，页22—24。

<sup>47</sup> 于帆，《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页I。

许泽盼指出，琦君饮食散文承载着其怀乡念亲的情思，其描写的不同的传统节日习俗里的食物也具有不同的寓意，饮食书写中还传达了人生哲理<sup>48</sup>。〈丰子恺散文中的饮食文化探析〉一研究中对丰子恺饮食散文中涉及的日常食俗、节日食俗、祭祀食俗等进行了探讨，并对其饮食书写中的这些食俗进行了溯源（故乡情结、佛家思想）分析<sup>49</sup>。

## 二 林语堂散文研究综述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学界对林语堂的研究，1979年以前多从鲁迅、胡风等左翼作家对林文章的政治印象批判方面着手，这是林语堂研究的开始。1985年后学界对于林语堂的研究才逐渐步入客观理性思考阶段，90年代至今是林语堂研究的繁盛时期，学界对于林语堂的作品研究多在散文、小说翻译传记等方面，但最集中的还是对林语堂散文的探讨，这跟其散文取得的成就有关。

林语堂散文的研究的热点主要在三方面，一是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性灵”文学观念；二是林语堂散文的文学价值；三是林语堂的比较研究。学界对于林语堂饮食散文的专题研究较为稀少，但也有极个别学者就此进行了简要分析。

林语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倡导幽默闲适轻松的文学观引起了当时很多学者的批评，后世对于这种文风进行了许多研究。本人分析了不少研究发现诸多研究者在分析林语堂幽默文学观念总将其与闲适观、性灵观联系在一起，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杜江晖的〈林语堂散文幽默观初探〉提出，林语堂的散文辛辣且尖锐揭露了一

---

<sup>48</sup> 钟瑾，《论沈宏非散文的饮食书写》（广西：南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页I—II。

<sup>49</sup> 贾晓珉，〈丰子恺散文中的饮食文化探析〉，《长江丛刊》2016年12期，页38—39。



些社会问题，促进了当时散文的发展。但同时因背离了当时时代的审美而具有部分局限性<sup>50</sup>。但也有学者对其文学观是否脱离社会持不同看法，张宇菊在分析林语堂散文的幽默风格指出，林语堂的幽默来源于林的童年生活以及对东西方文化的吸收。她认为林的幽默，在把握与时代的距离上处理恰当，在散文功用上也是文美兼具社会批判<sup>51</sup>。陈秀珍称林语堂散文的幽默具备三方面要素，分别是从容面对人生跌宕、快乐与悲伤照单全收、文章节奏要一气呵成。同时还指出林语堂的散文是融汇了东西方特色的散文<sup>52</sup>。

关于林语堂散文的价值研究，苏静、赵苗在〈试论林语堂散文的当代文化价值〉称林语堂促进了东西方散文的交流与学习，林语堂的散文把中国的人文主义展示给世界欣赏<sup>53</sup>。张洁〈另一种角度的思辨——林语堂散文解读〉从不同角度对林语堂散文的意义价值进行了解读，一方面认为林散文的闲适风格与当时的动乱年代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又提出林语堂求“真”的散文对于当时散文界充溢的激进文风是一种缓和与补充<sup>54</sup>。此外还有一些冷门的价值研究，如从语用角度切入研究林散文的修辞价值等。对于林语堂散文的比较研究也是学界关研究的一个热点。探研最多的是梁实秋与林语堂散文的比较。雷琰、范厚权〈浪漫与古典——林语堂、梁实秋文艺观之比较〉从文艺思想角度入手分析了林语堂与的散文特色，得出林语堂的散文幽默不受格式拘束，梁实秋的散文古典又有分寸<sup>55</sup>。贺美锋则是比较了梁实秋与林语堂散文的异同点，相同处包括作品中都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及诙谐的特点，不同处则主

---

<sup>50</sup> 杜江晖，〈林语堂散文幽默观初探〉，《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5期，页114。

<sup>51</sup> 张宇菊，〈论林语堂散文的幽默风格〉，《青春岁月》2017年26期，页30。

<sup>52</sup> 陈秀珍，〈寓庄于谐独具闲趣——林语堂散文的幽默〉，《武夷学院学报》2010年6期，页57。

<sup>53</sup> 苏静、赵苗，〈试论林语堂散文的当代文化价值〉，《文教资料》2017年27期，页50。

<sup>54</sup> 张洁，〈另一种角度的思辨——林语堂散文解读〉，《镇江高专学报》2012年3期，页29。

<sup>55</sup> 雷琰、范厚权，〈浪漫与古典——林语堂、梁实秋文艺观之比较〉，《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4期。

要体现在审美观、词句风格两方面<sup>56</sup>。此外还有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的一些比较研究，此处不做太多延伸。值得一提的是吴周文、张王飞的〈汪曾祺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sup>57</sup>，学界对于汪曾祺与林语堂的比较研究稀少，此文指出汪文对于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在当代文学史产生了重要意义，此文可作为研究汪曾祺与林语堂饮食散文比较的一个突破口。

有关林语堂饮食散文的专题研究目前所知的仅有蒋含璐、陈佳佳所写的〈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文化解读〉、朱希祥〈食品—人生意义的表现与折射—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上）〉、〈中西比较：自然—文化—政治—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下）〉三篇。蒋、陈之作篇幅简短，简单的分析了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批判意义及作品中烟、酒、茶的文化内涵<sup>58</sup>。朱希祥的两篇研究，上篇从林语堂饮食散文中饮食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林语堂饮食文化将饮食与民生、政治等结合来展开研究<sup>59</sup>，下篇从自然、文化、政治三个角度对林语堂饮食散文中涉及的中西文化比较进行探讨<sup>60</sup>。

### 三 汪曾祺散文研究综述

学界研究汪曾祺，初期的主要对象是汪曾祺的小说，90年代至今是研究的扩大阶段，随着汪曾祺散文研究的逐步发展，这时期诸多学者对于汪曾祺的思想理念也颇感兴趣。众所周知，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点，但学界对于汪曾祺的散文研究

---

<sup>56</sup> 贺美锋，〈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散文特点比较〉，《青年文学家》2013年4期，页43。

<sup>57</sup> 吴周文、张王飞，〈汪曾祺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江苏社会学科》2014年2期，页171。

<sup>58</sup> 蒋含璐、陈佳佳，〈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文化解读〉《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sup>59</sup> 朱希祥，〈食品—人生意义的表现与折射—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上）〉，《食品与生活》1997年第1期。

<sup>60</sup> 朱希祥，〈中西比较：自然—文化—政治—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下）〉，《食品与生活》1997年第2期。

却没有小说研究那样繁多，所以直到现今关于汪曾祺的散文研究都没有很全面。针对汪曾祺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题材类型、文化内涵、创作渊源以及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至于汪曾祺饮食散文的研究，学界已有多人进行了探索。

研究界在探讨汪曾祺散文的题材类型时将其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人物散文、游记散文与饮食散文。

阮崇友在〈试析汪曾祺散文的题材特色〉中将汪曾祺的人物散文又细分为自传性散文、师友散文，同时也提到其游记散文集山水景物与历史人物、民俗风土于一身。王艳蕾研究指出汪曾祺的散文无论是游记类，还是饮食类与人物类，都处处可窥汪曾祺学者式的人道主义情怀<sup>61</sup>。卞永清则从平民化角度出发，提出自己对汪老不同类型散文的理解，饮食散文追求的是人间烟火与平民趣味，以师长为主题的人物散文体现了汪老对前辈的敬重与感激，游记散文里有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sup>62</sup>。此外学界对于这三种题材散文的单独研究也颇多，例如任娜〈浅析汪曾祺的记人散文〉、陈思《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等。

汪曾祺散文的文化内涵也是学界着重研究点之一。诸多学者在进行汪散文研究时都会对其文化意蕴进行一些探讨扩展。柯玲在〈汪曾祺特色的文化性解读〉中提出一个别有趣味的词“水性”，她认为水性是汪曾祺创作的特色文化底蕴之一，并在散文方面表现尤为突出<sup>63</sup>。李婧竹用淡、润、净、雅四词来概括汪散文的审美意蕴。

关于汪曾祺散文的艺术特色，既有对于其审美美学、语言结构的专项研究，也有散文整体的综合研究。黄科安在〈“边缘化”与闲适之文——论汪曾祺散文的审美艺术〉中

---

<sup>61</sup> 王艳蕾，〈昭显生活 随性灵动——汪曾祺散文创作论〉，《湖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页121。

<sup>62</sup> 卞永清，〈平民化的汪曾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期，页82-85。

<sup>63</sup> 柯玲，〈汪曾祺特色的文化性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2期，页178。

指出“闲”“静”“淡”“趣”构成了汪散文艺术的独特价值<sup>64</sup>。鲁晓霞在〈汪曾祺散文的艺术个性〉中认为汪曾祺的散文在文体特征、审美、结构与语言四方面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sup>65</sup>。

对于汪散文的创作渊源，学界大都将其归结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黄科安就指出汪曾祺身上不止有儒家的影响，还有道家文化的浸润，儒道互补才使汪散文达到了充实与空灵的境界。但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郑晓玲在〈论儒道精神对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汪在散文创作中巧妙避开老庄哲学中的消极部分与儒家对于礼法的严苛要求，将书写重点转向尊重人的意志自由发展，使传统儒道现代化、生活化<sup>66</sup>。周荷初〈汪曾祺散文创作管窥〉认为其散文扬长避短式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传统<sup>67</sup>。

在对汪曾祺散文研究的过程中，很多学者运用了比较方法来进行研讨。学界对汪散文最常见的就是将汪曾祺与其恩师沈从文的散文进行比较。潘秀芹《沈从文、汪曾祺散文比较研究》从时代、个人经历、散文功用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沈文矛盾的忧愁感与汪文古朴的超脱有内在联系又不同发展，最终得出二人同中有异的观点<sup>68</sup>。如林奕伽将汪曾祺与周作人的饮食散文进行比较，但只是简单陈述双方文章，并未从深层次挖掘文章的异同点及原因。总体来说，对于汪曾祺散文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还有待进一步的扩展。

---

<sup>64</sup> 黄科安，〈“边缘化”与闲适之文——论汪曾祺散文的审美艺术〉，《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3期，页49。

<sup>65</sup> 鲁晓霞，〈汪曾祺散文的艺术个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期，页70-72。

<sup>66</sup> 郑晓玲，〈论儒道精神对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影响〉，《大众文艺》2019年7期，页42。

<sup>67</sup> 周荷初，〈汪曾祺散文创作管窥〉，《当代文坛》1993年4期，页28-30。

<sup>68</sup> 潘秀芹，《沈从文、汪曾祺散文比较研究》，（中国山东：山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页1。

虽然汪曾祺饮食散文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多为短篇小制，且大都是从文化内蕴来进行佐论。高慧雯在〈论传统饮食文化与汪曾祺散文的关联〉一文里指出汪曾祺将传统饮食作为一个主要的文学书写对象，其目的一是丰富文学的表达形式，二是借饮食传达自己的情绪与文学追求<sup>69</sup>。张雨凡〈饮食与人生的深层互动—评汪曾祺饮食散文〉中认为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将其对人生、对文化的想法通过饮食这一媒介表达出来，为现代人们提供精神指导<sup>70</sup>。学界唯一对汪曾祺饮食散文有较长篇幅解释的陈思的《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是从四个部分—饮食文化意蕴、京派传承与个人特色、饮食情结原因、价值与局限来进行分析的<sup>71</sup>。此篇研究在文化意蕴方面对于笔者的研究主题会有一些帮助，但总体来说本研究较之要更为广泛，研究过程中还将涉及到艺术笔调与创作者生活经历等方面的比较，也会在细节处进行更多的强化。

以上就是林语堂与汪曾祺散文的研究综述，通过整理可得出以下结论：一、学界对于林语堂的研究主要是从其文学观与其散文价值和比较方面进行探讨，学界对于汪曾祺散文的研究是从题材、创作缘由、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进行探究；二、学界对于二者的饮食散文研究皆未成严整系统，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的数量远胜于林语堂饮食散文研究，目前已知林语堂饮食散文研究仅3篇，同时也发现研究界从未对二人的饮食散文进行过比较研究。学界较长篇幅研究汪曾祺饮食散文的是陕西师范大学陈思的硕士论文《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从文化意蕴、京派传承与个人特色、创作缘由、价值局限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在介绍京派传承与艺术特色方面陈思认为汪曾祺的饮食

---

<sup>69</sup> 高慧雯，〈论传统饮食文化与汪曾祺散文的关联〉，《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6月第18卷第2期。

<sup>70</sup> 张雨凡，〈饮食与人生的深层互动—评汪曾祺饮食散文〉，《新纪实》2021年第33期。

<sup>71</sup> 陈思，《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中国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论文，2017），页1。

散文在题材上、审美上与周作人和梁实秋具有一致性，个人特色则以口语化较短篇幅一笔带过。

###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问题

#### 一 研究范围

研究范围涵盖汪曾祺与林语堂所有涉及饮食题材的散文。笔者已搜集汪曾祺与林语堂散文著作集共 22 本。其中林语堂的散文著作集有 13 本。汪曾祺的散文著作集有 9 本。研究范围图示如下：

作家	著作集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林语堂	《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第一卷》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2 年
	《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第三卷》	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7 年
	《爱与讽刺》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0 年
	《林语堂随笔精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林语堂批评文集》	广东：珠海出版社	1998 年
	《林语堂自传》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0 年
	《大城北京》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林语堂自述》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5 年
	《美国的智慧》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13 年
	《人生当如是》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13 年
	《生活的艺术》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13 年
	《我站在自由这一边》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13 年
	《吾国与吾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年
	《汪曾祺全集 4 散文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

	《汪曾祺全集 5 散文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
	《汪曾祺全集 6 散文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
	《汪曾祺全集 9 谈艺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
汪 曾 祺	《汪曾祺全集 10 谈艺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
	《汪曾祺全集 12 书信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
	《汪曾祺散文精选：有味清欢》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随遇而安：汪曾祺散文》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故乡的食物》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 二 研究问题

林语堂与汪曾祺的饮食书写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发展，本篇研究欲从二人的饮食散文比较角度入手，对他们的饮食类散文进行通篇阅读及有重点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前人对于二者的研究进行发散与创新。笔者立意从创作题材、艺术笔调、文化意蕴、饮食书写异同的原因四方面去探究他们的饮食散文。还有就是探讨林语堂与汪曾祺通过饮食作品想要表露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生活追求，探讨二人饮食散文的建树及它们之间或隐或显的内质关联，并借比较这一视角对二人饮食散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进行梳理、补充探索。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一 文学风格学方法

风格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具有独创性的总特点<sup>72</sup>。童炜《文学风格论》中指出，文学风格的内涵包括创作个性、有机整体性、言语结构以及审美享受四方面。他认为文学风格是作家的“名片”，是人们辨识不同作家的标记。是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稳定的标志<sup>73</sup>。每一个作家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文学风格，可使用比较的方法，对处于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风格的异同之处进行研究。正如王元化所言，在分析具体作家的风格时更要注意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从常中有变或变中有常的角度加以仔细的分辨和剖析<sup>74</sup>。

学界对于汪曾祺与林语堂饮食散文的分析中，少见研究型、深层次的风格分析，存在表面式或主观性的文本论断。本研究拟用文学风格学的研究方法对林语堂与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开展比较研究，主要通过对作家们的创作题材（怀旧、哲思）、艺术笔调（文学审美情趣、语言风格）、文化意蕴（知识考证、饮食文化）、饮食书写异同原因（家庭背景、文学根植、求学经历）等方面进行比较，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和解剖，力图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题材是风格的基本要素<sup>75</sup>，本研究第二章“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的创作题材比较”中，提及二者饮食题材方面的共同处是对故乡及旅居地饮食的怀旧书写，不同处是林语堂借饮食书写倡导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而汪曾祺是苦中作乐的人生哲思。“文体就是风格的载体，他们是一些持久性的体制、样式、类型，都是广义的语言秩序”<sup>76</sup>，在第三章“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的艺术笔调

---

<sup>72</sup> 王明居，《文学风格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页5。

<sup>73</sup> 童炜，《文学风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1。

<sup>74</sup> [德]歌德等著、王元化译，《文学风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页82。

<sup>75</sup> 王明居，《文学风格论》，页27。

<sup>76</sup> 童炜，《文学风格论》，页32。

比较”中，提出了二者饮食书写的艺术笔调上有一共同点，即文学审美情趣上一脉相承的“性灵”与“闲适”，这一小节涉及到了体裁（小品文、散文）理论研究。语体就是语言的体式，是文体的第二层面<sup>77</sup>，第二小节从句式的使用、修辞特点等方面对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不同的语言风格进行分析。使用文学风格学方法探究二者饮食散文的异同之处，可以从多个方面丰富二者饮食散文的研究，打破以往学界对二人饮食散文单一的个案分析，从流于表层的感悟式分析进入到学理性理论探讨。

## 二 文学社会学方法

20世纪中期，文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被视为标志性著作，他提出，文学社会学应该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探讨“文学是事实”这一社会事实。埃斯卡皮认为，在循环互动的交流渠道中，作家会提出各种心理、伦理、和哲学问题，作品会展现审美、文体、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形式问题<sup>78</sup>。文学社会学方法就是社会学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建立起较为可信的论证基础并进而达到对文学及其相关的社会与人的理解。这种方法强调文献调查与社会调查相结合<sup>79</sup>。陈国恩学者在《文学社会学视角中的现代文学经典》中曾指出，文学是人学，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的关系<sup>80</sup>。

在运用文学社会学方法进行汪曾祺与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比较研究之前，首先要对饮食文化与饮食文学的概念与理论有一个明确。

《人类饮食文化学》指出：“饮食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在饮食生活中创造产生的饮食观念、行为、技术及其饮食产品的总和，是人类通过自然选择、约定俗成与环

---

<sup>77</sup> 童炜，《文学风格论》，页35。

<sup>78</sup> 方维规，《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21。

<sup>79</sup> 郜积意，〈当代社会学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河北学刊》1995年4期，页59。

<sup>80</sup> 陈国恩，〈文学社会学视角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02期，页105-112。

境最相适应的饮食生活方式。饮食文化所拥有的技艺体系表现为人类生活的一种特色性文化过程模式。它是人类对饮食生活的自由选择，来源于人类心灵对超越自然的渴望。”<sup>81</sup>王学泰的《华夏饮食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其对于饮食文化的理解，在他看来，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所以书中讨论到的食物、饮食习俗等等，都围绕人、人群的关系及其产生的社会意义，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sup>82</sup>。分析两位学者对于饮食文化的界定，可得出饮食文化与社会、与人群是密不可分的结论。

说到饮食文学，游丽云在《怎样情色？如何文学？台湾饮食文学中的情色话语》对饮食文学的解释——所谓「饮食文学」，应该是作者借饮食而写出作者的生命实感，这才是撰写「饮食」却能称之为「文学」的关键<sup>83</sup>。《饮食文学范畴的建构：一个社会学式的考察》一文中通过梳理饮食文学的发展历史，列出了两套饮食文学美学判准，一套认为饮食文学应摆脱实用性，追求的应是意在味外的文学境界；另一种则强调饮食文学不一定非得拉到抒情的层次不可，只专志于磨练描写食物的文字，或是深究与食物相关的文化哲理也是一种饮食文学的可能，甚至比前者更为重要而基本<sup>84</sup>，强调了饮食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通过分析上述提及的饮食文化与饮食文学定义，可得出饮食文学是以饮食文化为基底、文学为载体反映社会生活及作家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学形式。

社会学家认为，文学作品及其经历的相互联系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它包含着作家及其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作用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

<sup>81</sup> 陈苏华，《人类饮食文化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页4。

<sup>82</sup> 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页7-8。

<sup>83</sup> 游丽云，《怎样情色？如何文学？台湾饮食文学中的情色话语》（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8），页1。

<sup>84</sup> 江浩，《饮食文学范畴的建构：一个社会学式的考察》（台湾：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页96。

而作品本身又为社会文化环境所接受，并对这种环境作出反应<sup>85</sup>。处在特定环境中的人，也就是创作者本身（林语堂、汪曾祺）在当时的时代和社会中会产生了一些多面、繁复的关系，这些错综的关系又会对他的思维方式与书写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终二者使用文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将之记录、体现。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不管是分析饮食散文的创作者经历对他们的饮食书写造成差异方面，如相似的家庭背景、文学观，不同的求学历程；还是分析汪曾祺与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文化意蕴层面、饮食散文的语言风格必定都会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家庭环境、人生经历对于创作主体及其作品是如何产生作用造成影响的。

### 三 研究价值

近年来饮食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在饮食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知识积累、历史渊源、风土民俗等。汪曾祺、林语堂同为闲适派代表作家并著有大量饮食散文，然而二者的饮食散文比较研究极少，本论文希望通过这两位作家饮食散文的比较研究来扩宽学界对于饮食文学的了解以及对闲适类型作家的剖析，同时使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进一步呈现。

---

<sup>85</sup> 方维规，《文学社会学新编》，页 21。

## 第二章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的创作题材比较

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首先会对自己的写作对象亦或是文章选材进行明确，这就是创作题材。中国文学理论家唐弢先生认为题材是生活经验在作品中的反映与融化<sup>86</sup>，《写作》一书里这样定义题材：“一般指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也泛指经作者筛选、加工、组合，写到作品或文章中，用以表现主题的材料”<sup>87</sup>，故而在进行林语堂与林语堂书写的创作题材比较时，除了对饮食散文中的选材进行分析外，作家们通过这些题材想要传达的感悟更是我们要着重进行探究的。

### 第一节 对故乡及旅居地饮食的怀旧书写

谈及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的创作题材，不难发现他们的饮食散文在此方面是有同质性的，他们都将视角对准了家乡一些再普通不过的家常风味，也将自己生活过的城市特色小餐还原至纸上。乡愁与怀旧历来是饮食书写的一个重要要素，正如钟怡雯所言：“作者以食物为饵来垂钓记忆，而记忆也往往籍由唇舌来到笔下”<sup>88</sup>，林语堂与汪曾祺在这些不起眼的食物中都倾注了深刻的回忆与惦念。

出生于福建龙溪地区的林语堂 17 岁时便背井离乡赴上海求学，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辗转各地，随着年岁的增长对于故乡的思念也是日益加深。1974 年他在自己的自传〈八十自叙〉里回忆童年，说起儿时父亲总剩半碗留予他的猪肝面：“我从来没吃过味道那么美的猪肝面”<sup>89</sup>，同年他在〈说乡情〉一文中坦言故乡的印记从出生起便已进入他的骨血，家乡的味道在他的血脉里流淌、与他的身躯融为一体。为此特意列诗一

---

<sup>86</sup> 唐弢，〈八、题材的搜集和主题的确定〉，《文章修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页 96。

<sup>87</sup> 王光祖、杨荫浒，〈第二章 材料〉，《写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 29。

<sup>88</sup> 钟怡雯，〈记忆的舌头—美食在台湾散文的出没方式〉，页 257。

<sup>89</sup> 林语堂，〈八十自叙 第二章 童年〉，《林语堂自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 207。

首，把漳州的各种水果（香瓜、荔枝）、蔬菜（鲜笋）、早饭（软粥）以及具有思乡盼归深意的鲈脍莼菜羹一一罗列<sup>90</sup>。

与林语堂相似的是，汪曾祺也是青年时代离开家乡高邮外出求学，漫长的岁月中奔波于各处，与故乡的距离越拉越长，然而故乡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一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说过：“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故乡总是忘不了的”<sup>91</sup>，高邮在他的文学作品里频繁出现，他写家乡的山水遗迹，写家乡的人情故事，高邮的特产美食更是占据了大量篇幅，在他的笔下显现着鲜明的地方饮食特色。即使时光如梭，但那些带着家乡味道的饭菜还一直印在脑海中。

汪曾祺写儿时饭桌上的常客——各种鱼虾蟹，因为是高邮盛产所以价格比新鲜蔬菜还要便宜，他自豪于父亲可以用家乡的鱼做出螃蟹的味道、用河虾做虾松，他骄傲道：“我也吃过别人做的‘虾松’，都比不上我父亲的手艺”<sup>92</sup>。他写家乡用来佐茶的干丝，这种豆腐制品也是汪父拿手的一道好菜，青蒜加花生米，干丝微烫同拌，味道甚好<sup>93</sup>。他还写高邮最出名的咸鸭蛋<sup>94</sup>、写皮子。汪曾祺印象中的家乡常与战祸与饥荒联系在一起，在那些艰苦日子便捷类食物应时而生，比如炒米、焦屑<sup>95</sup>。靠水的高邮还总遇到洪涝，便只能喝茨菇汤，茨菇汤也成为其孩童期最不喜的食物，然而晚年的汪曾祺却时常怀念那种味道：“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sup>96</sup>，记忆中的故乡再也回不去了，那些原本普通差强人意的食物也成为一种渴求的味道，这些食物寄托着汪曾祺对饱经磨难的故乡的爱怜之情。

---

<sup>90</sup> 林语堂，〈说乡情〉，《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 第三卷》（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页355。

<sup>91</sup> 汪曾祺，〈平心静气——《布衣文丛》代序〉，页397—398。

<sup>92</sup> 汪曾祺，〈我的父亲〉，《汪曾祺散文精选：有味清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页67。

<sup>93</sup> 汪曾祺，〈干丝〉，《汪曾祺全集6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99。

<sup>94</sup> 汪曾祺，〈端午的鸭蛋〉，《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67。

<sup>95</sup> 汪曾祺，〈炒米和焦屑〉，《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65。

<sup>96</sup> 汪曾祺，〈咸菜茨菇汤〉，《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70。

福建的猪肝面真的那么好吃嘛？汪父制作的虾松、拌干丝真是天下美味吗？未必。赵静蓉在《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一书中提到过，怀旧活动一个典型特点是具有乌托邦功能，即形成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怀旧发生者会把故土等客体幻化为一种完美存在，“在对此情境的感性中寄托某种稳定感”<sup>97</sup>，林语堂与汪曾祺记忆中的猪肝面与虾松里掺杂的是父亲们舐犊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意进入到食物中使得林语堂与汪曾祺久久无法忘怀那滋味。与其说他们怀念故乡猪肝面、虾松、拌干丝的味道，不如说他们怀念童年在故乡与父亲相处的时光，怀念儿时被疼爱的感觉。

林语堂与汪曾祺的饮食散文中对传统节日里的故乡饮食也进行了多处描写。林语堂笔下的冬至一定要吃汤团，即使当日忘记也一定要在第二天补上才心安<sup>98</sup>。除夕喝腊八粥、准备好福建蜜橘，元旦要食桂圆条、鸡肉面，还有萝卜粿。其在1935年创作的〈纪元旦〉一文中记载了家里人没从厦门寄来萝卜粿，自己坚持外出购买的经历。因为那是福建新年一定要摆上桌的小吃，有着家乡味道的新年对他来讲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年<sup>99</sup>。将对于节日的崇敬与神往寄托在食物中，这些食物因而有了尘俗气，更让在异乡的林语堂多了几份归属感。

汪曾祺笔下的除夕节，汪家人是要一起过的，祖母的鸭羹汤、荷叶鸡和猪油拌好的蒸圆子是他难忘的团圆饭。不同的节日家中会做不同的菜，清明祭祖吃白切肉和绿豆粉，鬼节要做“烧包子”<sup>100</sup>……一家人坐于餐桌上的温馨时刻早已远去，他笔下的这些食物，储存着他年少时与家人在高邮相处的点滴回忆。节日在故乡有故乡的过

---

<sup>97</sup> 赵静蓉，〈第一章 何为怀旧 五、怀旧情结的审美内核〉，《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76。

<sup>98</sup> 林语堂，〈新年恭喜〉，《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 第三卷》（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页279。

<sup>99</sup> 林语堂，〈纪元旦〉，《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 第三卷》（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页356-358。

<sup>100</sup> 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汪曾祺散文精选：有味清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页78-79。

法，有一些食物的特殊吃法也只有在故乡的佳节里才能品尝到。那些美食不仅承载着家人们含蓄的爱，也是情感的延续，寄予着他们对亲人的漫长思念与缅怀。

除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饮食进行书写外，林语堂与汪曾祺的饮食散文题材还囊括了他们曾经生活过、学习过的城市饮食，分别是北京、昆明。生命在感知客观对象的活动中不能永远在场，但回忆却能使生命在经验世界中“故地重游”<sup>101</sup>。艺术家的怀旧，实际上是对经验的一种重新审视与发现。他会发现记忆经验与现实感觉的距离，并用“此在”的心灵状态去体验“朝花夕拾”的感觉<sup>102</sup>。

林语堂在北京有过两次任教大学的经历，1916年他任教于北京清华学校，三年后赴美国读书。1923年学业完成后又回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英文系<sup>103</sup>，1926年因“三一八惨案”及军阀割据的动荡时局被迫离开北京。他在那座他用“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来形容的城市里生活了6年之久。两去两离，他对北京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北京在他心里始终是放不下的，于是在举家前往美国之前也一定要再回北京一趟，完成告别。在他的眼里，北京的美可以对应到每个季节的食物上。春天可以去中央公园喝茶赏绿吃热腾腾的面条，夏天有爽口的酸梅汤解暑，冬天北京老酒馆里的烤肉、烤洋葱、七十度的老白干驱走寒冷，北京的深夜还会有小贩沿街叫卖糖水汤圆、冻柿子、糖葫芦夜宵零食，那些断续的吆喝对林语堂来说是件倍感幸福的事。在北京的四季里，因为有美景与这些食物的陪伴，人的精神是放松的、心情是愉悦的。林语堂因而发出了“它使现实的生活带上了一种梦幻般的性质”的慨叹<sup>104</sup>。

在异乡的林语堂，也会有失意的时刻。他在自传中总结北大教学生涯时提到，在北大自己因为常对一些时事观点发表看法宛若异类，“我恒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

---

<sup>101</sup> 刘雨，〈绪论〉，《艺术经验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页4。

<sup>102</sup> 刘雨，〈绪论〉，页5。

<sup>103</sup> 黄万华，〈第八章 国统区文学 第六节 林语堂、梁实秋的创作〉，页289。

<sup>104</sup> 林语堂，〈贰 四季〉，《大城北京》（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页13-14。



（北大）一个激烈的分子”<sup>105</sup>，正是北京温和包容的生活方式与食物慰藉了一个异乡人的心与胃，缓解了林语堂的孤独与失落。北京的生活方式是最为林语堂所称赞的，他用“可爱”这一词来概括其特点。在北京这样一个以“繁华辉煌”为标签的大都市中，普通的肉店、茶馆皆随处可见，这意味着即使贫穷如车夫一样的下层人士，也能保证最基础的餐食，简单的食物就可以让这里的市民获得满足<sup>106</sup>，北京赋予了他的民众安时处顺的心态与朴素的生活理想。林语堂喜爱北京荤菜保留原味的特点，标榜其为“正宗”，还有一些北京餐馆与特色菜是他所推崇的，提起这些北京的美食，林语堂如数家珍，东兴楼的虾子豆腐是身处异国他乡时最想念的一道美味，还有尝起来会让人感叹鸡没白死的芙蓉鸡片、正阳楼用鸡蛋喂养的螃蟹、顺治门便宜坊的北京烤鸭、西门砂锅居的猪肉边角料美食、明远楼的家养牛肉等<sup>107</sup>，这些食物记载了林语堂在北京的快意平生与穿街走巷的那份舒适感。

如同很多人难以忘却学生时代生活一样，昆明求学的七年在汪曾祺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汪曾祺表示“按居留次序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sup>108</sup>，那里的一切都让他非常怀念，他对昆明的美食更是不吝笔墨尽情介绍。论及昆明哪里是汪曾祺最难忘的地方，那答案一定是茶馆。联大附近的茶馆就没有他不知道的，有专门招待大学生卖清茶、香片的新式茶馆、有绍兴人开的茶馆里不光卖茶还提供萨其玛等甜点、有卖茶也卖咖啡但在汪曾祺看来属无趣的茶馆、有卖血肠的茶馆等，他还特地罗列了三大点（养正气、茶馆看书学习、接触社会）来解释泡茶馆对于联大学生的益

---

<sup>105</sup>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 第七章 由北平到汉口〉，《林语堂自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 24。

<sup>106</sup> 林语堂，〈动人的北京〉，《爱与讽刺》（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 60-61。

<sup>107</sup> 林语堂〈玖 民众生活〉，《大城北京》（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页 113-115。

<sup>108</sup> 汪曾祺，〈觅我游踪五十年〉，《汪曾祺全集 5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 301。

处，笑言自己的文学成就都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sup>109</sup>。茶馆是他大学记忆中的一个标志性地点，在那里有他和同学喝茶谈天论地的肆意青春，也是他观察形形色色人与事、培养写作兴趣的伊始，汪曾祺通过写在昆明泡茶馆的种种琐碎来追忆旧时读书与消遣的欢乐时光。

除了泡茶馆，汪曾祺还会在昆明的雨季与好友去莲花池赏景，猪头肉配半斤柿酒，边吃边听雨声淅淅沥沥，那种心底里浮现的充盈喜悦使他人到暮年也无法忘记，写下了“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sup>110</sup>的内心感触。汪曾祺对于昆明汽锅鸡的评价极高，解释昆明汽锅鸡之所以好吃是因为锅是云南建水特制、鸡是武定鸡，要达到这两个条件才汤清而鸡有味，然而可惜的是现在昆明饭馆里的鸡已经不是当年他念书时选用的正宗武定鸡了<sup>111</sup>。时过境迁很多东西已然改变，他为此感到可惜和遗憾。

不同于书写高邮饮食情感的那种坦诚纯粹，汪曾祺在介绍昆明食物时会无意识间展现出伤感情绪，回忆昆明的松子时他唏嘘道：“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磕就开了”<sup>112</sup>，松子还是松子，只是当年牙口倍棒的小伙子们已进入了古稀之年，徒生几分无力之感。汪曾祺写在联大醉酒被沈从文先生带回家喂浓茶解酒、牙疼沈先生给他买橘子、与沈先生去吃一角三分钱的米线等经历，沈从文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帮助他，在生活中也是默默表达自己的关心。即使过去了那么多年，那些低廉、不起眼的食物，汪曾祺却依旧清楚记得。他借昆明的饮食表达了对老师的思念

---

<sup>109</sup> 汪曾祺，〈泡茶馆〉，《汪曾祺散文精选：有味清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页113-119。

<sup>110</sup> 汪曾祺，〈昆明的雨〉，《随遇而安：汪曾祺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页66。

<sup>111</sup> 汪曾祺，〈昆明菜—昆明忆旧之七〉，《汪曾祺全集5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12-13。

<sup>112</sup> 汪曾祺，〈跑警报〉，《随遇而安：汪曾祺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页58。

与敬重。那种“他乡亦故乡”的眷恋是真情实感的，旧日师生的情谊在他的笔下也是历久弥新的。

历史长河中时间转瞬即逝，能证明切身感受过、体验过的痕迹便只有怀旧了，一道道食物饱含着林语堂与汪曾祺对故乡与旧时生活过的地方的热爱与不舍。纵使时过境迁，那文字当中的浓厚乡情与悠悠乡愁却仍旧感染着我们。

## 第二节 饮食书写下不同的人生哲思

除了对故乡与旅居地饮食的怀旧书写外，林语堂与汪曾祺还借饮食书写表达了各自的人生哲思。林语堂擅从享乐角度切入去谈饮食与生活的关系、去探究饮食对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影响。他的笔触与视野没有局限在事物表层，而是以一个寻根究底、追本溯源的态度去剖析饮食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与天然本质，透过饮食去思考生活的真正目的，他的人生哲学观是及时行乐。汪曾祺则执着于发掘饮食的诗意功用、借饮食去展示人与生活和洽相融的乐趣，旨在让人们“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sup>113</sup>，这是一种苦中作乐的人生哲学。

林语堂哲学主题下的饮食书写，传达了重要一点，那就是生活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也不是非要界定一个目的或意义，他希望人们都能“享受”自己的人生。他在自传中提到：“可是我生来便是一个伊壁鸠鲁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吃好味道东西最能给我以无上的快乐”，在他看来，不压抑自己的口腹之欲乃是一件极致幸福的事情。

烟草是茄科烟草属的一种植物，人们所食用的都是烟草的叶片，烟草的主要用途是制成各种成品烟供吸烟者吸用<sup>114</sup>，烟是文人墨客都爱好的消愁解乏之物，也被视为创作的灵感来源。吸烟，就是将烟点燃之后用口将烟吸入<sup>115</sup>。林语堂是有名的爱烟人士，然而他也有放弃自己“心头好”的时刻。〈我的戒烟〉一文里他用“一时糊涂”、“走入歧途”、“处境太闲”、“无事可做”等词来形容自己的一段戒烟经历，戒烟的那些日子里生理与心理都产生了不适，生理上的不适借助吃糖喝茶等方式尚可缓解，然而心理之不适却始终如鲠在喉，最终他历时三星期的煎熬结束了这段“丑史”，得出了“思想之贵在乎兴会之神感，但不吸烟之魂灵将何以兴感起来？”的结论<sup>116</sup>，重新又吸起烟来。由此可见“饮食”在林语堂心目中的地位确实很高。他的〈饮食〉一篇说：“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吾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sup>117</sup>。对他来讲，清晨的深呼吸、手中有烟斗、饱食美味餐饭后坐在椅上与好友谈天论地都是理想中的快乐，那是来自内心最质朴的渴求。

---

<sup>113</sup> 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409。

<sup>114</sup> 袁庭栋，〈一 烟草与人〉，《中国吸烟史话》（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页1-6。

<sup>115</sup> 袁庭栋，〈一 烟草与人〉，页11。

<sup>116</sup> 林语堂，〈我的戒烟〉，《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 第三卷》（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页335。

<sup>117</sup>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三 饮食〉，《吾国与吾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页305。

林语堂在〈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一文里表达了对现代人类文明的隐忧与同情。他陈述现代人类获取的食物经过种种加工才呈现到餐桌，若野生动物来到现代文明一定会为人们获取食物而这样繁杂的程序感到惊奇和不解。世间庸忙的人们将自己如俘虏一般驯养在社会这个牢笼中，只为获取食物生存。在这种机械重复的劳苦中，早已经失去了细细品尝食物的食欲。这是通过饮食对现代文明生活的一种折射与思考。正如林语堂所言他信奉伊壁鸠鲁学派，其对于饮食与生活的看法正是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的一个体现，伊壁鸠鲁在写给梅璠凯的信中提到了人类的欲望有助于幸福的生活，“正确无误的思考会把一切选择和规避都引向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无烦恼……我们的一切追求和规避都开始于快乐，又回到快乐，因为我们凭借感受判断所有的好”<sup>118</sup>，这种快乐至上的观点对林语堂产生了极大影响。

吸烟对身体不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代入到林语堂自身，吸烟有助于他心胸开阔、文思踊跃，那不好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是快乐的事，饮食与快乐挂上了对等号，那他便遵从本心。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失去了享受美食的乐趣，这在林语堂看来是得不偿失的。透过饮食，他想传达的哲学观点是人只有摆脱外界条条框框的教条束缚，享受生活本原的趣味，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林语堂的饮食散文中涉及了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哲学思考。他用一个聚餐的场景举例：“当我看见一批男女老少在享受一个欢乐的野宴时，叫我怎能说得哪一部分是属于物质？哪一部分是属于精神？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在草地上跳跃，还有一个孩子用雏菊在编造一个小花圈，母亲的手里拿着一块夹肉面包，束缚在咬着一只甜美的红苹果，父亲仰卧在草地上凝望着天上的白云，祖父口中含着烟斗……”<sup>119</sup>，林语堂认为，精神享受与物质肉欲看似难以区分，但实质上还是有所不同。他不觉得艺术的欲望就比口腹的欲望高级到哪里去，数学解式或探索宇宙奥秘等一切智能欢乐中最单纯的快乐在其看来“反不如去吃一顿丰盛的餐食来得开心”<sup>120</sup>，他提出艺术宗教类的精神享受恰恰是为了服务人的诸如嗅觉味觉等物质机能，以此来获得本性的解放，从而达到体悟人生快乐的目的<sup>121</sup>。

---

<sup>118</sup> 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著、包利民等译，〈三 致梅璠凯信（伦理学纲要）〉，《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页 31。

<sup>119</sup>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生命的享受〉，《林语堂随笔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页 173-174。

<sup>120</sup>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生命的享受〉，页 188。

<sup>121</sup>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生命的享受〉，页 187。

林语堂还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代入到饮食里。他在〈一个素食者的自白〉中用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来说理，吃素食没什么不对，但不要过犹不及，戒酒者是在戒酒期间小酌几杯的，素食者有时也应该适当补充一些肉类。最后转借孔子说出了自己对于“极端素食者”的看法：“即使发现了最伟大的科学真理却变成非人道，则又有什么好处呢？”<sup>122</sup>，他借此告诉人们任何事都要把握一个度，这样理与情就可达到平衡状态，继而在这种平衡中逐渐获得快乐。林语堂指出，“无论哪一种人生哲学，他必须以我们的天赋本能的和谐为基础……这便是孔子的孙儿在中庸一书里所倡导的学说”<sup>123</sup>，可见他对儒家“中庸哲学”的赞同。在这些富有深意的文字里，他哲学主题下的饮食书写更具可读性与思考性。

与林语堂饮食书写传达及时享乐的哲学不同，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常盈满诗意。在汪曾祺看来，生活是如诗一般的，若有一颗平和乐观的心，困苦的光景也能充满诗意与阳光，不失美好与安然。他将诗意与作家的社会职能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活着是美好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sup>124</sup>，诗意是执笔者对于客观生活中美的发掘，汪曾祺乐于将生活的诗意写入饮食散文中，寄望于这些文字带给人们慰藉与力量。

汪曾祺笔下的诗意是通过生活里的行为与情感来诠释的。劳动是人们维持生活的手段，为食物而辛勤劳动在汪曾祺看来无疑是一种诗意的行为。他的〈葡萄月令〉一文里完整叙写了种植葡萄的流程，从一月伊始的葡萄藤、三月上架、四月灌溉、五月开花……八月着色丰收、九月补药<sup>125</sup>……在这个培育食物的过程中，劳动者们付出大量的体力劳动，但这种劳动是心甘情愿的，是满怀憧憬的。他们在长达一年的辛苦后最终才收获了品质上乘的葡萄，葡萄蓬勃生长的生命力冲淡了枯燥的农忙生活，劳动的艰辛早已被葡萄丰收的喜悦所取代，在劳动中劳动者们感受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这里的葡萄被当成一个生命体，有了人格的象征，劳动者把感情倾注到被劳动的对象中，劳动成果给予他们心灵上的抚慰，这是诗性的栖居与发散。汪曾祺并未直接称赞葡萄的口感，而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展示了种植葡萄的繁忙，经过汗水灌溉的食物滋味

---

<sup>122</sup> 林语堂，〈一个素食者的自白〉，《爱与讽刺》（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100。

<sup>123</sup>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生命的享受〉，页189。

<sup>124</sup> 汪曾祺，〈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全集10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359。

<sup>125</sup> 汪曾祺，〈葡萄月令〉，《汪曾祺散文精选 有味清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页41-46。

更为美好，劳动这一活动也充满了诗意美，更充满了创造力。人类的很多感受是经由生活经验发散获得的，饮食作为一种常见的生存行为，是情感的一个重要载体，这也是汪曾祺极力将书写回归到食物的一个原因。江阴有家水果店的香味令他念念不忘，“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sup>126</sup>，初恋的感觉回想起来总萦绕着水果的香气。青春期的情感萌动是不掺杂任何杂质与考量的，这种情感是一种纯洁羞涩的情感，正如残缺也是一种美，尽管它是遗憾的，却无法回避它是年少时情愫的记录，这种甜蜜的忧伤在数十年后依旧散发着魅力，他希望大家可以建立发现美与希望的意识，给自己一份面对庸世的勇气。

汪曾祺笔下的饮食还可以使得人们从忧愁中解放出来，获得身体上的补充与心灵上的宽慰。1946年他从昆明前往上海找工作，中途为等船滞留在香港，面对前途的迷茫，他对喜欢的海味也失去品尝的兴趣。然而无意间观察到一块“不中吃”的芋头在煤堆中顽强生长，他乍生希望。那种低落的境况突然受到启示很是欢喜雀跃的心情他却仅用淡淡的一句“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sup>127</sup>来带过，情感的表达虽克制然韵无穷，但那种对于生命的欣喜与珍视令人动容。1958年汪曾祺在文联系统整风复查中被错划为“右派”，同年10月下放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研究所劳动<sup>128</sup>，虽然他笑谈这段经历使得自己平淡的人生变得不那样寡淡，但劳动是辛苦的，何况是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的文人，身体与精神上都面临着压力。“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可以谈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sup>129</sup>，但他没有自怜自叹，依然选择乐观面对生活，劳动结束后留在下面一个马铃薯研究站干杂活，那段漫长的时光里他把情感寄托到饮食上，自豪放言全中国找不到像他那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sup>130</sup>，还将单一的食物马铃薯入画，最普通不过的马铃薯在他笔下也可以诗化，食物使得他在逆境中能够保存对未来的期冀与热爱。

食物咀嚼与消化的过程或许短暂，但通过饮食感受到的那份鼓舞会持续很久很久。他在饮食的天地里尽情徜徉遨游，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吃”。他做菜，不用精心挑选食物的种类，什么都可以拿来烹调，想做一个雪里蕻炒笋，家里没有冬笋，那就

---

<sup>126</sup> 汪曾祺，〈果蔬秋浓〉，《汪曾祺全集6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260。

<sup>127</sup> 汪曾祺，〈生机〉，《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153-154。

<sup>128</sup> 汪曾祺，〈汪曾祺年谱简编〉，《汪曾祺全集12 书信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347。

<sup>129</sup> 汪曾祺，〈散文四篇 马铃薯〉，《汪曾祺全集5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3。

<sup>130</sup> 汪曾祺，〈随遇而安〉，《随遇而安 汪曾祺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页232。

用荷兰豆<sup>131</sup>。不去专门去考虑食物的价值意义，这种人类最基础的生理活动，不需要功利层面的思考，吃饱首先就是最顶级的道理。他喜爱自创美食，最有名的就是那道肉馅油条，“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捉摸出来的”<sup>132</sup>，因为对生活的热爱，所以才愿花费时间去琢磨，因而把平凡的生活过的热热闹闹、快意无比。在那些饮食散文中，汪曾祺致力于挖掘人间的至臻诗意，他传达了即使是平淡的生活，在有心的经营下，也可以萦绕诗意与浪漫的观点。他的诗意饮食题材里保留的是生活至真的情调与趣味，展现的是一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些最终构成了他呈现于读者眼前的众生百态相。

综上，对家乡的热爱及对旧日时光的怀念使得林语堂与汪曾祺把这些地方美食作为他们饮食书写的题材，他们在饮食散文中讴歌着亲情、师生情等真挚的情谊，缅怀着过往的温情岁月，他们用饮食观照人生、观照社会。当然，有同即有不同，林语堂的人生哲学是及时行乐，是希望人人都能过上一种坦然舒心的生活，这种坦然舒心是一种幸福感，是一种情感体验，只有正视自己的真实欲求，发自真诚的亲近自己的情感才能享受生活，成为生活的主人。汪曾祺则用一种淡然释怀的态度触碰饮食搭建的人间万象，他想要呈现的是对生存状态的追问，在平淡的生活中去寻找闪光点，去观照美，去挖掘诗意，把生命里的苦难化为向前推进的动力，展现生命的韧劲与坚强，这是一种苦中作乐的人生哲学。

---

<sup>131</sup> 汪曾祺，〈食道旧寻〉，《汪曾祺全集 5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 250。

<sup>132</sup> 汪曾祺，〈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 108。



### 第三章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的艺术笔调比较

艺术笔调指作家在表现社会生活时所显示的叙述情趣和语言风格。<sup>133</sup>生活在不同时代的林语堂与汪曾祺因中国传统儒道思想与明清散文滋养、“悠闲”观念、“边缘化”经历等方面的影响，二者的饮食散文在叙述情趣上呈现出相近的“性灵”与“闲适”。语言风格上各具特色，林语堂的文字是恣肆通俗的，汪曾祺的语言多为朴实简单的短句。

#### 第一节 一脉相承的“性灵”与“闲适”

关于散文的概念，“古代散文”是现代后追加的一种叫法，古代散文实指古文（八股文），晚明时期一些带有娱乐消遣性质的古文发展为小品文，相对于正统古文，这种文体不光可以抒发情感，还夹杂着一些议论以及叙事描写<sup>134</sup>。现代小品观念是建立在现代新文学观念和新散文观念上的，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经历了林语堂 Essay Style、傅斯年 Essay、周作人“美文”几种观点的演变，最终胡适正式将“小品散文”、“小品”概念确立。现代文学开创时期，广义的现代小品文概念对等通行散文，可以说，小品即散文，散文即小品。另一观点认为小品、小品文、小品散文都属于现代散文，是一种从属关系<sup>135</sup>。40年代将小品、小品散文概念统称为文学散文<sup>136</sup>。

现代30年时期，各种思潮群涌，不同文学立场的派别互动尖锐，革命文学发展如火如荼，林语堂选择从民主主义的激流中抽身，转向了对个人人生的观照。他说：

“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sup>137</sup>、“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

---

<sup>133</sup> 庄涛，〈艺术笔调〉，《写作大辞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页195。

<sup>134</sup> 欧阳俊，〈现代小品及其相关概念论〉，《现代小品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页25。

<sup>135</sup> 欧阳俊，〈现代小品及其相关概念论〉，页27-28。

<sup>136</sup> 欧阳俊，〈现代小品及其相关概念论〉，页30。

<sup>137</sup> 林语堂，〈悠闲的重要 尘世是唯一的天堂〉，《生活的艺术》（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122。

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sup>138</sup>，他对外界的纷扰充耳不闻，以纯真自我的心性肆意领略生活之趣。1932年-1935年间他陆续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sup>139</sup>，谈及目的，其指出虽中国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但还未达到西方时间上浪漫主义的积淀。“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sup>140</sup>，因为内心情绪在根源上无法释放，所以不能正确平衡苦难与快乐的界限，便无病呻吟。在林语堂看来，文学可脱离政治并以人的所求为辐射展开书写，故而他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小品文来疗愈人心，正视人生。张颐武认为“闲适”是对超然古典境界的向往，是安静平和、追求优雅趣味，是“文人”精神风格的表现，是边缘的、独立的、隐士式的境界体验<sup>141</sup>。从林语堂对小品文书写的要求中也能概括出“性灵”与“闲适”的含义，那就是张扬自我个性，追逐身心自由。正如他说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sup>142</sup>，个人情感要真实外放，尽情享受快意人生。

之所以把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共有的叙述情趣定义为一脉相承的“性灵”与“闲适”是有据可循的。学界对于汪曾祺与林语堂性灵、闲适观的关联研究可以追溯到吴周文、张王飞的〈汪曾祺与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sup>143</sup>，这篇研究把汪曾祺作为“通俗抒情诗人”的三个特点（情感的坦诚、永葆童心、发声世道人心）及冷热轻的幽默诉求看做其性灵与闲适观的表现，并将汪曾祺闲适观对新时期文学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但总体来说，这篇研究的对象是林语堂与汪曾祺的闲适小品文，并没有特针对饮食散文中的“性灵”与“闲适”进行具体分析，二者饮食书写中一脉相承的“性灵”与“闲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sup>138</sup> 林语堂，〈真正的威胁——观念，不是炸弹〉，《爱与讽刺》（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230。

<sup>139</sup> 黄万华，〈第八章 国统区文学 第六节 林语堂、梁实秋的创作〉，页290。

<sup>140</sup> 林语堂，〈我办《论语》〉，《人生当如是》（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104。

<sup>141</sup> 张颐武，〈闲适文化潮流批判——从周作人到贾平凹〉，《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页14。

<sup>142</sup> 林语堂，〈八十自叙 第一章 一捆矛盾〉，《林语堂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页71。

<sup>143</sup> 吴周文、张王飞，〈汪曾祺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页171。

表现之一是他们均属“边缘化”的作家，他们都在饮食书写中体味生活，展现性情。林语堂与汪曾祺规避了所处时代的文学主流，提倡自由、率性，专注个人、悠闲，这种“边缘化”既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文学方向，也是与时代主流相悖的结果。当代中国文坛在经历了一些动荡后，70年代末至80年代占主流的文学多为“伤痕”、反思”、“寻根”类型，而汪曾祺反其道而行，以一种破空而来的姿态将“休闲”“书我”这种惬意、放松的文学主题作为书写对象继而开始一系列的小品文创作。

何谓“休闲”？在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中，休闲是闲情、闲趣、闲心。闲情是指看待生活的心态，即用超功利的目光去体味人间，这样凡事都悠然<sup>144</sup>，闲趣是指书写的题材，世上万物哪怕只是一株花草一道简单菜肴在其笔下也皆有可写之趣；闲心是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觉出美妙并将其记录，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种闲适的心情并与读者产生共鸣，继而也能使读者感受到悠闲与静美。正如他所言：“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sup>145</sup>

何谓“书我”？即是对自我真性情和在文学创作原则上的一种坚持。汪曾祺这样定义文学思想，“所谓思想，我以为即是作者自己所发现的生活中的美和诗意，作者自己体察到的生活的意义”<sup>146</sup>，他坚持文学思想要求真且要来源作者自身的经历。他认为作家的创作自由是“可以挥洒自如，从心所欲”<sup>147</sup>。其师沈从文曾指出作品需要性格，这种性格是作者自我人格与情感的结合<sup>148</sup>，而这也恰恰是“书我”主题的重要表现之一，沈从文为汪曾祺“书我”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

<sup>144</sup> 汪曾祺，〈平心静气——《布衣文丛》代序〉，《汪曾祺全集10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397。

<sup>145</sup> 汪曾祺，〈谈散文〉，《汪曾祺全集10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422。

<sup>146</sup> 汪曾祺，〈道是无情却有情〉，《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195-196。

<sup>147</sup> 汪曾祺，〈生活·思想·技巧——在张家口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280。

<sup>148</sup> 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225。

汪曾祺在〈《汪曾祺小品》自序〉里讨论了中国小品文的发展史：“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兴起，大概是三十年代”<sup>149</sup>，他所提到的三十年代小品文，就是林语堂的论语派小品文创作。一方面汪曾祺指出国家危难之中此种类型的文章似乎不那么合群，显得突兀与飘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悠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从苦难中另辟一条出路未尝不可。从汪曾祺的话里行间能够看出他并不排斥以悠闲娱乐为主题的文学类型，对于此类文学他展现的是认同的态度。

自1958年被打为“右派”始，十余年来身心的折磨使汪曾祺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与感悟，他无比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他指出文学作为披荆斩棘的利器固然没错，但若是滋润人心的暖茶也颇有意义。同林语堂的选择一样，汪曾祺认为饮食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但又时常被忽略作用的角色是值得被书写的。除了承继林语堂希望在饮食活动中“享受快乐、专注自我”的目的外，饮食散文的审美与文娱功能应该得到重视是汪曾祺在饮食书写上新的拓展。“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sup>150</sup>，匆匆忙忙、飞扬浮躁的尘世，理应有一些文学为人们提供休憩的角落，让百姓们感受万物可爱，生之欢愉，让人们透过最简单不过的食物也能获得一些体悟。这便是汪曾祺眼中饮食散文存在的意义。

表现之二是他们都受到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滋养与明清散文的影响。林语堂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一种热忱的向往，纵观其散文创作，有不少篇目表达对中国古代文人儒士的赞美与欣赏。他谈中国儒学、道学、佛学的相互渗透、谈孔子的坚韧与乐天知命、孟子的大爱与善观、老子给其带来的思想冲击、陶渊明的谦逊与坦白、苏东坡的卓越才华等等，可见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之大。汪曾祺也直言中国古典文学与民间文

---

<sup>149</sup> 汪曾祺，〈《汪曾祺小品》自序〉，《汪曾祺全集10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207。

<sup>150</sup> 汪曾祺，〈葵·蕻〉，《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144。

学对他作用较深，“我以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作家，都会或多或少地接受这样那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孔子的影响、孟子的影响，老庄的影响，甚至佛教禅宗的影响”<sup>151</sup>。

林语堂对明代后期出现的文学流派——三袁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性灵派）也不吝夸奖。他称其为自由发展的学派，这种自由发挥使得他们的文章少见雕琢，皆是发乎本心的所想所感。“这派中的作家都反对模仿古人或今人的，反对一切文学技巧的定例”<sup>152</sup>，袁氏兄弟主张解放作家的个性，强调文章的书写真情流露，林语堂的“性灵”观部分程度上来自于此学派的启蒙。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学流派，不论是公安派，还是竟陵派、唐宋派等，大都主张文章要取之日常，直抒胸臆。汪曾祺的许多散文创作中也都能寻觅到这一主张，因而他直言：“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sup>153</sup>。就此来讲，林语堂与汪曾祺散文“性灵”“闲适”的文艺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后的呈现，最后相应体现到了二者饮食散文的叙述情趣中。

表现之三是林语堂幽默的认同。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位将“humor”翻译成“幽默”的作家<sup>154</sup>，他认为幽默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方式，具有明理与近情品质的人才可创作出幽默之作品。幽默接近于讽刺，但不同于讽刺、嘲弄的尖刻，“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幽默是一种慈悲，是笑泪相间<sup>155</sup>。林语堂指出中国现代散文虽看起来已摆脱“文以载道”风格，但实际上中国的一些作家在写作中还是没有摆脱这种无形的控制，文学还是要趣味一些才好。幽默不是哗众取宠，越是真正的幽默，就越是立足于实际，正如洗尽铅华后的返朴归真。他的

---

<sup>151</sup> 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428。

<sup>152</sup> 林语堂，〈写作的艺术〉，《生活的艺术》（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280。

<sup>153</sup>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395。

<sup>154</sup> 黄万华，〈第八章 国统区文学 第六节 林语堂、梁实秋的创作〉，页289-290。

<sup>155</sup> 林语堂，〈论幽默〉，《我站在自由这一边》（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200。

幽默不是那种雕琢出来的、招人厌烦的油腻，也不是让人哄堂大笑的类型，而是看后不自觉的哑然失笑。

例如，林语堂曾写买了一只鸟后去点心店用饭的经历，点餐一碗馄饨和一碟白切鸡，昏了头的伙计只顾看鸟便回会唱吗？林语堂答道：“唱，白切鸡能唱吗？”<sup>156</sup>，这种取材于生活、冷不丁的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又如〈香烟与香〉中列举香烟的好处，先挑明吸烟者不自杀，究其缘何竟是吸烟者不和太太吵架。不自杀与不和太太吵架有什么关系呢？再解释嘴里塞着烟斗是无法高声叫喊的，最后得出“为妻者或许不能平抑丈夫的发怒，但烟斗则是从不失败的”<sup>157</sup>的结论，使人不禁发出会心一笑。再如他写中国人的口味不挑剔，什么都可以做成菜，地球上的所有，都能填到肚子里，“吾们实在为地球上唯一无所不食的的动物，只要吾们的牙齿健在，吾们将永远保持这个地位”<sup>158</sup>，这种夸张戳中笑点，但他随后又笔锋一转，道出这种境况是因为中国人人口太多、连年饥荒致使的，笑过之后又让人陷入深思与唏嘘。林语堂饮食书写中的幽默是简单的，他笔下令人发笑的地方读者回头来看就好似自己平日里也会经历这样的瞬间。林语堂饮食书写中的幽默，又是隐晦的。他的幽默里有着他对民族、社会的观照与审视。越是真正的幽默，就越是立足于实际，正如洗尽铅华后的返朴归真。

汪曾祺的饮食散文认同林语堂“幽默要来源真实”的观点，除此之外，他对幽默还有自己的诠释。汪曾祺的幽默不见弯绕，是简单干脆的直白。〈逐臭〉一文写了与朋友在长沙去找火宫殿的臭豆腐品尝，大家跟着味道找，“到了跟前，是一个公共厕所！”<sup>159</sup>，写在北京国宾馆外弯腰采摘野菜与保安对话的经历，“他大概以为我在埋

---

<sup>156</sup> 林语堂，〈买鸟〉，《人生当如是》（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31。

<sup>157</sup> 林语堂，〈生活的享受 五 香烟与香〉，《林语堂随笔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页211。

<sup>158</sup>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三 饮食〉，页304。

<sup>159</sup> 汪曾祺，〈逐臭〉，《汪曾祺全集 6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

定时炸弹”<sup>160</sup>，这些细节的描写既新奇又令人发笑。汪曾祺的幽默没有夸诞式捧腹大笑，他说真正能让人有认同感的幽默反而是那种如水一般清淡却接地气的幽默。幽默在他看来还是一种心境，“唯有幽默，才能对万事平心静气”<sup>161</sup>。他回忆昆明读书时常常要跑空袭警报，“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sup>162</sup>，原本血肉横飞、充满危险的、弥漫战争气息的警报，在他笔下，那种战乱的痛苦与紧张消失不见，变成了促进少男少女情愫、适合谈恋爱的好时机，满满的诙谐感与调侃意味。有跑警报的同学，还有两位同学是不跑警报的。每到警报响起，一个洗头，一个煮莲子，即使炸弹声在不远处炸开，也还是神色自若的洗他的头、煮他的莲子。这都是一种反差的幽默，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坦然面对灾难的坚韧态度。他的幽默是澹泊的，是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内里填塞着宁静与释怀。把庞杂、繁乱的东西简单化、质朴化。

---

<sup>160</sup> 汪曾祺，〈故乡的野菜〉，《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76。

<sup>161</sup> 汪曾祺，〈平心静气—《布衣文丛》代序〉，页398。

<sup>162</sup> 汪曾祺，〈跑警报〉，页58。

## 第二节 “恣肆通俗”与“平淡简练”的语言风格

文学语言是文学作品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载体。文学内容、思想、感情都是通过其来传达与演绎，语言可以直观展现作者遣词造句的文学功底，读者也可从中窥见作者的文化修养。受“性灵”、“闲适”理念的影响，林语堂的饮食散文在语言方面并不恪守文章的章法规格，他常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一些饮食散文会围绕主题书写，还有一些不见主题也能展开叙述。篇篇不同，字句不重。不见修饰，只感畅快与惬意。总结来说，“恣肆通俗”是林语堂的语言风格。

虽然汪曾祺继承了林语堂“性灵”与“闲适”的观念，但其在林语堂文学观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变通与想法，所以即使文学观、叙述情趣相似，他们在书写方面也会有差异。且作家们受派别、表达方式、表达习惯、个人性格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个主题，语言也会呈现不同的风格。

文如其人，汪曾祺饮食散文书写朴素而平淡。但平淡并不意味着寡淡，他补充：“要在平平常常的、人人都能说的，好似平淡的语言里边能够写出味儿”<sup>163</sup>，他曾用川菜“开水白菜”的烹饪方法来对平淡与有味间的界定作了说明，材料可以普通，但汤一定要是高汤，即运用语言的功夫一定要到火候。所以他在俗常的语言又加入了自己的审美个性与品味去调和增彩，那些书写看似随意，其实很多用词都是几经揣摩与斟酌后才落在纸上成文。除了平淡外，汪曾祺饮食散文的语言风格还有很大一个特点，那就是简练，他直言衡量语言的目标与重要标准就是使人能快速又切实的了解作家写了什么样内容，所以语言越简单、越准确为妙。

---

<sup>163</sup> 汪曾祺，〈文学语言杂谈〉，《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442。



林语堂的饮食散文语言闲散流畅、自在灵活，多为散开的句子，没有特定的结构支撑，东拉西扯，自成风貌。但在这些散句当中，又常见一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如排比“七磅牛排；八磅火腿；八磅小羊排；两只鸡……”<sup>164</sup>、对偶“男学生的出路是吃饭，女学生的出路是出嫁”<sup>165</sup>、比喻“做学问工作如吃草，做文人时论如吃肉”<sup>166</sup>等等，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增加了饮食散文的可读性与趣味性，文句虽然肆意，但也不失严整。他的饮食散文口语化强、引人入胜。林语堂在散文书写中有意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我创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一样”<sup>167</sup>，他的饮食散文中大量出现的“你”、“我”、“她”、“你们”、“我们”、“他们”等人称词，这种词的用法使得文章内容真实也更具亲切感，好似与读者共坐一桌在品尝美食后交换意见。除此之外，其饮食散文还增添了反问与一问一答等句型，“只吃鸡蛋菠菜又怎样能真正地欣赏素食的美味呢？”<sup>168</sup>，反诘的语气提出了对于只机械用食的素食者能否领会素食鲜美的质疑，将问题抛给了读者，看似没有答案，其实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引领读者朝他给出的方向去思考，文章互动感增强，有闲谈与聊天之感，不生硬不刻板。

在林语堂的饮食散文中，常可窥见一些夸张甚至荒诞的词语，以轻松、滑稽的笔调展开丰富的想象。他写中国人对于动植物类生物学不感兴趣，缘由是中国人一提及吃便丧失了冷静，他由此妄诞的延引出自己之所以不找中国医生做手术是怕其在做肝脏手术时忘记了手术内容而想着将他的脏器放入油锅内煎炸的想法<sup>169</sup>，用一种言过其

---

<sup>164</sup> 林语堂，〈我怎样买牙刷〉，《林语堂随笔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页77。

<sup>165</sup> 林语堂，〈读书阶级的吃饭问题——中学生的出路问题〉，《我站在自由这一边》（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46。

<sup>166</sup> 林语堂，〈吃草与吃肉〉，《我站在自由这一边》（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184。

<sup>167</sup> 林语堂，〈第十一章 论美国〉，《林语堂自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240。

<sup>168</sup> 林语堂，〈一个素食者的自白〉，页101。

<sup>169</sup> 林语堂，〈论肚子〉，《生活的艺术》（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37。

实的写法来突出中国人重视饮食与事物的实用功能，这种夸张的写法使饮食散文颇具说理性。

在他看来，运用俗语可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且各个阶层的读者都易理解其含义，通俗又生动。他形容抽象派的女人肖像：“远看似香肠。近看蛋花汤。原来是太太。哎呀，我的娘！”<sup>170</sup>，民歌体的打油诗浅显易懂，读来趣味横生。他说我们不需要抚慰人心的漫谈录，我们需要或我们喜欢那股粗俗的灵气、连珠的妙语以及全部的“下流语言”<sup>171</sup>。〈糍粑与糖元宝〉一文对闽南与江南祭灶君吃糍粑与糖元宝食俗进行了描写，用食物黏住嘴与用美食甜住嘴都属下作手段，林语堂故意将这两种腐败做法进行高低区分，平添几分讥嘲意味。猪嘴是吐不出象牙的，但吃了糖元宝的“猪”不光能够长出象牙，还会替喂它糖元宝的人家美言几句。这里提到的“猪”隐喻当时社会中趋炎附势、谎话成性的中国国民。文末故作懵懂地发出了一个疑问，今日中国的“猪”，必须要考虑一下，是要甜的糖元宝，还是糍粑黏嘴？如此直言不讳的嘲讽让人惊讶的同时直呼过瘾。

汪曾祺饮食散文不爱长篇大论，语言上多短句与白话口语，断句遵循精简的原则。这样书写是为了更靠拢平素生活，也满足人们对食物的想象与回忆，引发共鸣。对话简单，常见行云流水般的一问一答，用精辟的字句再现生活画面，如他写在北京买茨菇，与人对话，“这是什么？”——“茨菇”<sup>172</sup>，写随剧团在重庆演出时的趣事，剧组演员去当地餐馆不管三七二十一当头就来句不要辣椒，厨师也直白回应辣椒不放在汤圆中<sup>173</sup>，简洁明了。年轻时汪曾祺喜将对话写得深刻又富哲思，其师沈从文

---

<sup>170</sup> 林语堂，〈杂谈奥国〉，《人生当如是》（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235。

<sup>171</sup> 林语堂，〈第三章 我们的动物遗产 一、用精神分析法研究现代人〉，《美国的智慧》（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36。

<sup>172</sup> 汪曾祺，〈咸菜茨菇汤〉，页69。

<sup>173</sup> 汪曾祺，〈四方食事 口味〉，《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4。

指出，生活里满口警句属实不合理，“对话写的越平常，越简单，越好”<sup>174</sup>，贴近日常的对话才最真实，才能传神地勾勒出生活的韵味。短句不等同于语言的呆板与干枯，为了弥补与克服短句的单调，他在书写中还加入了一些文言句、四字句、谚语、歇后语等。如为了表达人们追求好味道引用了孟子的“口之于味，有同嗜焉”<sup>175</sup>，形容羊肉口感，“不膻固好，膻亦无妨”<sup>176</sup>，介绍铁蚕豆用北京的歇后语“老太太吃铁蚕豆——闷了”<sup>177</sup>，文言与口语在汪曾祺的饮食散文中和谐地交融，这些句式的运用使文章读起来更有韵律，既充斥生活气息，也不失古典文化感与美感，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

汪曾祺的饮食散文语言平淡却不失魅力，这与他在语言运用方面善于通感的修辞手法有关。通感是在言语活动中，因本觉和通觉的相互作用，感觉特征多向位移而生成的审美话语形态<sup>178</sup>。通感把人的各个器官的感觉相互挪动互通。如他写春天清晨赶早卖枸杞的女孩子，未曾见到少女，却已经先听到少女的声音，“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sup>179</sup>，简单的两句话富含着无限想象勾勒出一个有着干净纯真嗓音的女孩子。他介绍高邮鸭蛋的食用方法，“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sup>180</sup>，“吱”字形象地把筷子戳破鸭蛋的动态展现在读者面前，视觉体验化为了听觉体验，“吃”这种极具个人化的活动在他的笔下变得富有参与感，这样的语言是富有生命力的。

---

<sup>174</sup> 汪曾祺，〈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全集 10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 72。

<sup>175</sup> 汪曾祺，〈四方食事 口味〉，页 3。

<sup>176</sup> 汪曾祺，〈四方食事 口味〉，页 3。

<sup>177</sup> 汪曾祺，〈食豆饮水斋闲笔 蚕豆〉，《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 29。

<sup>178</sup> 高志明，〈1 也谈通感的定义：本书研究的起点〉，《通感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页 42。

<sup>179</sup> 汪曾祺，〈故乡的野菜〉，页 180。

<sup>180</sup> 汪曾祺，〈端午的鸭蛋〉，《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 67。

除了善用通感外，他注重动词与拟声动词在饮食散文中的运用。写丁丁糖涉及有掇、击、丁、震等动词<sup>181</sup>，汪豆腐的做法涉及切、推、滚、勾、盛、浇一系列动词<sup>182</sup>，最为经典的是他的拌菠菜，细细数其出现的动词——洗、焯、捞、过、剁、挤、抻、切、泡、捏、堆、调、淋、推、拌<sup>183</sup>，竟多达十五个之多。这样一连串动词的使用让读者仿若现场观摩了一场美食的制作，烹饪菜肴的过程生动且立体感十足。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是咯吱咯吱的，北京的萝卜切下去是咔嚓嚓的，昂嗤鱼叫起来是昂嗤昂嗤的，这些拟声动词的使用让画面鲜活了起来，语言也颇有节奏感，俗常却饶有趣味。

汪曾祺简练寥寥的两三句书写便可让人味蕾跳动，看起来平淡的字句细品又有悠悠的回甘，读来如饮一盅文火温吞慢煮的米粥，喝来淡而无味，实则清润滋补、大味至简，给读者留了充足的时间去咀嚼、去品味。他把俗常的生活用文字审美化，将其上升至文艺的高度。这种审美化在他的笔下，是看到豌豆在沸腾热水中咕嘟咕嘟煮时会想到北京的沥沥夏雨，是卖杨梅的少数民族少女手捧杨梅时清澈纯真的目光，也是儿时写大小字呈与祖父检查时泡在宜兴砂壶中的龙井酹茶。

---

<sup>181</sup> 汪曾祺，〈跑警报〉，页 58。

<sup>182</sup> 汪曾祺，〈豆腐〉，《汪曾祺全集 6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 64。

<sup>183</sup> 汪曾祺，〈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 104。

## 第四章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的文化意蕴比较

文化意蕴指蕴藏在文化形式（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中的社会内涵和审美趣味，如民族精神、历史意识、思维方式、心理机构和审美原则等<sup>184</sup>。饮食散文属于精神类的文化形式，林语堂与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在文化意蕴方面的相同点是二人的部分饮食文章都对涉及到的食物的名称、来历、典故、相关文学常识等进行了周密的解说与取证，看似简单随性的饮食书写中加入了严谨的知识考据。但他们在文化意蕴的表现上也存在不同的侧重点，一个将中西饮食文化进行了对比，一个对中国民间饮食蕴含的文化进行了挖掘。

### 第一节 严谨的知识考据

考据又称为考证。它是通过广集资料，鉴别真伪，究明正诘，分类归类，还史籍与史实的本来面目，从而求得正确解释历史问题的史料依据的史学方法<sup>185</sup>。林语堂与汪曾祺将这种方法应用到饮食散文的创作中，他们采用柔和与趣味的方式进行考据，避开了传统考据中存在的枯燥与刻板问题。

林语堂饮食散文中的知识考据不是机械的进行科普，而是根据自己的主题来进行延展。他的饮食介绍不是浮于表面，而是老练的将其中所含有的文化渊源给予呈现。例如林语堂写茶，引用明代陈继儒《小窗幽记》中的词句“清茶好酒，以适幽趣。臭味之交，如斯而已”<sup>186</sup>来佐证品茶的最佳状态要有志趣相近的好友和优美适时的风景两个先决条件才能达到。此外饮茶的人数、饮茶的方法、饮茶之乐趣以及古代烹茶流程他都一一引用古籍《茶录》、《茶解》中的文句来解释阐明。在此基础上林语堂又

---

<sup>184</sup> 吕智敏，〈文化意蕴〉，《文艺学新概念辞典》（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页320。

<sup>185</sup> 庞天佑，〈第一章 总论〉，《考据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页4。

<sup>186</sup> 林语堂，〈生活的享受 四茶和交友〉，《林语堂随笔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页206。

把家乡福建三滚泡茶的方法、自己定义的茶的十类享受技术（贮藏、茶水选择、茶味鉴别等）分别进行了罗列，文末引《茶疏》中的原句加以总结。读来仿若在参与一场茶文化盛宴，又似身临其境正在品味一壶醇厚甘鲜的清茶。

又如他介绍香烟，不光细心查证历来中国文学中对淡巴菇的相关描写，还把香烟与焚香这一艺术奇妙的联系起来。引屠隆《考槃余事》及冒辟疆《影梅庵忆语》里的原文将香料的类品、焚香方法及乐趣进行展现<sup>187</sup>，书香味十足。写中国人饮酒方面的讲究，用陈继儒《小窗幽记》与唐代皇甫松《醉乡日月》中的诗句“醉花宜画……醉雪宜夜……醉得意宜唱……”<sup>188</sup>来强调饮酒需适宜的环境及相应的心情方能体会其中之趣。

再如他分析人类“肚子”这一生理器官的影响力，从社会文明角度入手，开篇引中国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饮饌部〉的序言对口腹之欲的危害及产生危害的原因进行了解释<sup>189</sup>，本以为这是一篇批判“肚子”的文章，没想到林语堂话锋一转指出人类进食是天生的行为，既不能违反自然规律，那尽情的享受岂不妙哉，随后还从饮食对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影响方面展开了分析。在林语堂的知识考证中，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营养早已被他吸收并形成新的演绎，各类知识典故在其笔下信手拈来，最终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眼前。

汪曾祺的饮食散文中也有大量的知识考据，这与他的职业经历不无关系。1948年汪曾祺在北京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1950年又先后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两个刊物任编辑一职<sup>190</sup>，职业素养使得他既要掌握丰厚的文学文化知识，又要在学术

---

<sup>187</sup> 林语堂，〈生活的享受 五香烟与香〉，《林语堂随笔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页215-216。

<sup>188</sup> 林语堂，〈生活的享受 六酒令〉，《林语堂随笔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页219。

<sup>189</sup> 林语堂，〈论肚子〉，《生活的艺术》（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页34-35。

<sup>190</sup> 汪曾祺，〈汪曾祺年谱简编〉，页344-345。

工作中一丝不苟。这种职业素养对他之后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那就是凡引必考，凡举必究。

汪曾祺饮食散文中虽时常穿插各种知识考据，但这些考据通常不会占据太大篇幅，与文章所要表达的主旨相应合而不会喧宾夺主。正如他在《蒲桥集》书封小语中自述“间作小考证，亦自喜”<sup>191</sup>，可见他对于散文中夹杂一些考证、抒情中贯穿微许理性这一方式的喜欢与赞同。

例如写及烤肉，汪曾祺对烤肉这一名词是否源自少数民族进行了诸多考据。他查证发现日本汉文学家青木正儿《中国腌菜谱》一书中将烤羊肉命名“成吉思汗料理”，但《元朝秘史》中却无烤肉这一做法，更多是食用白煮肉，因此他认为烤肉这一词来源于蒙古料理的说法并不准确。随后引齐白石在北京一烤肉馆的题字注脚“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来证明自己的猜测，从语言学家朱德熙那里得到中国古代无“烤”字的回应后才谨慎写出“烤”字是近代所造、北京烤肉起源无法考证的论断<sup>192</sup>。此种慎之又慎的学术精神令人佩服。

又如写及海鲜河鲜，他的〈切脍〉一文把中国的切脍历史娓娓道来。从春秋时期《论语·乡党》中关于切脍的文句开始探讨，将北魏、唐、宋、元、明、清各朝有关切脍的文献记载都一一提及，几千年的文化史在他的笔下寥寥几句便已驾轻就熟勾勒出。古代切脍的形态、方法以及配料其都引典籍与诗作原文加以说明，此外汪曾祺还对现代存有切脍手艺的餐馆及替代菜品如呛虾醉蟹进行了罗列与评价<sup>193</sup>。考证真诚，叙述不急不缓、既接地气又文化感十足。介绍河豚，引苏东坡与梅圣俞的诗以及《东京梦华录》中“假河豚”的记载佐证宋朝时便已存有河豚这道佳肴<sup>194</sup>。写江浙沪地带

<sup>191</sup> 汪曾祺，〈文集自序〉，《汪曾祺全集 10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 283。

<sup>192</sup> 汪曾祺，〈贴秋膘〉，《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 40-41。

<sup>193</sup> 汪曾祺，〈四方食事 切脍〉，《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 6-7。

<sup>194</sup> 汪曾祺，〈四方食事 河豚〉，《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 8。

餐桌上常见的塘鳢鱼，从《随园食单》中对其别名“土步鱼”的外形描写延伸到现代苏州对这道菜的做法<sup>195</sup>，雅俗兼具，相映成趣。

再如谈论家乡的野菜，他就“簏”的读音在字典上发音为“楼”而在家乡高邮读“吕”不读“楼”进行了查验，还引苏东坡“萋蒿满地芦芽短”诗一句举证萋蒿为水生植物；高邮人对菹菜都不甚了解，都以为高邮自古不产此物，他借用北宋高邮名士秦观诗词《以菹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佐证秦观当时将菹菜鱼蟹作为特产送与苏东坡，进而得出古代高邮是存在此蔬菜的观点；写野菜还使他联想到明代高邮散曲作家王磐，汪曾祺列举了王磐《野菜谱》中记载各类野菜的诗句，那些诗让他忆起家乡连年水患造成的惨象，但随后又欣慰于现在吃野菜是为了满足尝鲜的目的而不是捱过饥荒<sup>196</sup>。他的知识考据不是单纯考证史实，是有他的感情与思考融汇在其中的。他的知识考据活泼易懂，具备文化气息与艺术色彩，文章的可信度也随之加深。

---

<sup>195</sup> 汪曾祺，〈虎头鲨·昂嗤鱼碎螯·螺蛳·蚬子〉，《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页70。

<sup>196</sup> 汪曾祺，〈故乡的野菜〉，页74-77。



## 第二节 中西饮食文化对比与民间饮食文化的书写

纵观林语堂的求学、生活经历，能发现西方社会文明对他影响深远，他在创作中用西方观点悟东方。但林语堂身上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东方气息，他热爱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任意徜徉，“中国对于我有特殊的摄力，如同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倚，自由无碍”<sup>197</sup>，这些使得其又能用东方视野看西方。他汲取了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并将二者和谐的融汇在一起。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面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能够被客观评价与接受是林语堂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致力于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直言：“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sup>198</sup>，在对中西文化分析的过程中，林语堂着重思考二者本身的特质及互补性，于对比中重新审视、解读中国传统文化，饮食便是其向外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林语堂的散文不止一次谈及中国厨师，他曾在自传中写及他所向往的生活：“我需要一个好厨子，他要会做素菜，做上等的汤”<sup>199</sup>，在一次国际集会中，其笑言中国的厨子是可以和英国的建筑、美国的先进暖气等并列列入世界理想的。这种多次提及与昭然赞赏的背后，显示的是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与林语堂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自豪。

林语堂从中西方对待食物的态度中得出中国人在饮食方面比西方成就斐然的结论。他列举中英两国不同的饮食态度，英国人吃东西带着抱歉的心理，中国人则是高

---

<sup>197</sup> 林语堂，〈第九章 无穷的追求〉，《林语堂自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 29。

<sup>198</sup> 林语堂，〈第八章 著作和读书〉，《林语堂自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 27。

<sup>199</sup> 林语堂，〈八十自叙 第一章 一捆矛盾〉，页 72。

兴的吃、进餐是为了感受食物的美妙滋味。正是因为要食得开心、食得畅快，中国人毫不掩饰爱吃的本能，直面生理性的口腹欲望，故而中国的饮食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而西方人在文明的进程中，却蔑视味觉这种感官，指责口欲的“低贱”。林语堂指出“学习怎样吃法的第一个条件是先谈论它”<sup>200</sup>，他认为，只有当社会的高文化层次人士开始尊重并承认烹调之术时，他们的饮食文化才能真正发展与成长。

他列举中国与西方文人墨客在饮食方面的创作，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在其诗作《大招》中通过回忆死前所食的各类美味来挽救自己的魂灵，“中国的伟大戏曲家李笠翁并不以为有损身份以写菰蓴烹调方法以及其他蔬菜肉食的调治艺术”<sup>201</sup>，然而西方的作家们却认为饮食没有价值而羞于将其写入作品中。中国雅士命名的菜比比皆是，诸如东坡肉之类，但在西方，用文学家名字命名菜肴将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有了文人雅士的加成，中国饮食文化在文艺色彩与美感方面更上一层楼，也更胜西方一筹。

林语堂还将中西方的烹饪方式进行了比较。他感慨中国人偏爱食物纹理带来的口感这一事实。蔬菜与肉类在口中迸发的软嫩与爽口之感，对于中国人来说堪称极致的享受。另外由于中国调味料种类繁多，所以特别看重饮食中不同品类食物味道的调和，“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甚于西式烹调”<sup>202</sup>，林语堂认为这种烹调方法相比西方单烹食物而混摆放要更为可口与具有视觉效果。他对中国的食补食疗文化也持肯定态度，“我们对于中国人的药食不分，应该庆贺。这个观念使他们的药物减少药性，而使食物增加其可食性”<sup>203</sup>，林语堂指出，相比西方治病的各种片剂针剂，中

---

<sup>200</sup>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三 饮食》，页 306。

<sup>201</sup>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三 饮食》，页 307。

<sup>202</sup>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三 饮食》，页 308。

<sup>203</sup> 林语堂，《生活的享受 七 食品与药物》，《林语堂随笔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页 225。

国的药材加食材即是一味绝好的药物，日常食用便能为身体提供不错的抵抗力。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食补学可为西方医学提供一些启发与帮助。

林语堂的饮食散文里并不是一味的吹捧抬高中国饮食文化，他也提到了一些中国饮食文化可向西方借鉴与学习的建议，如西方用不同的酒品来搭配菜肴、西式饮食恰当的食量、西方社交活动中不劝酒的文明礼仪等。除此之外，其在中西饮食文化的对比中还隐喻了自己对中西方交往的看法与见解。《一个素食者的对白》一文中，他写欧洲人就餐时举着刀叉传达威胁之意的姿态，发出了“欧洲人会不会学学用我们的木筷，允许我们（至少在我们吃的时候）少看见这些金属的武器呢？”<sup>204</sup>的诘问，林语堂将西方餐具刀叉比作“金属武器”，期冀对方可以学习使用中华民族具有“以和为贵”象征意义的木筷，表达了希望国与国之间彼此尊重、和谐交往的愿望。

林语堂的饮食散文反映着其对中西饮食文化的独特理解，也展示了他在中西饮食文化交流方面进行的有益思考与倡导。在对中西饮食文化的比较分析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热爱与认同，显现了强大的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豪感。

与林语堂不同，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对中国民间饮食文化进行了多重解读。中国数千公里的地域界限在汪曾祺的饮食散文中轻而易举被打破。东南西北各个城市的特色美食在他笔下穿梭自如，在其饮食书写中，我们既能感受到南方江浙小城独具特色的小食风味，例如淮安的狮子头、苏州的腐乳肉、绍兴的梅干菜烧肉等，又能追寻到山东、内蒙古等北方都会不拘小节、豪放的饮食习惯，“山东人特爱吃葱，吃煎饼、锅盔，没有葱是不行的”<sup>205</sup>、内蒙古的手把羊肉与各类奶制品、西北的柿饼子、莜面栲栳等。既写川渝的麻辣醇浓、又写云南的清淡滋补。他擅长将中国各地的民间风俗与饮食融合在一起进行书写，从老百姓司空见惯的食物中去挖掘蕴含其中的文化内

---

<sup>204</sup> 林语堂，〈一个素食者的对白〉，页 101。

<sup>205</sup> 汪曾祺，〈四方食事·口味〉，页 4。

涵，那些食物只是他饮食散文的载体，民间众生与中国民间文化才是他想要着力表达的重点。

所谓民间文化（folk culture）是指由社会底层民众集体创造的自发和自娱自乐的通俗文化。它主要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的具体背景<sup>206</sup>。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传统文化，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sup>207</sup>。民间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共同完成的生活赞歌，从中可以看到平民百姓们对普通生活的不同演绎与呈现。

民间饮食文化是民间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汪曾祺饮食散文中描绘的民间饮食文化充满了趣味性与学理性。从他的书写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渊博学识与文化气息。例如他写民间餐桌上最常见的豆腐，从苏浙一带用咸鸭蛋炒制的“硃砂豆腐”、汪豆腐、清代传承至今的顶尖素菜“文思和尚豆腐”、到川地区的麻婆豆腐、湘地区的菌油豆腐、徽地区的毛豆腐、北京的臭豆腐等等，汪曾祺对这些豆腐的介绍并不是流水账般带过，而是细数这些不同地区豆腐的烹制过程、佐料配菜及渊源故事，他将民间饮食文化吃准了嚼透了之后才呈现出此般的盛宴给读者品鉴。同一样食物，在不同地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做法与味道，四方美食尽在纸上，读者不用出门，便可阅尽大江南北的膳食滋味，读来令人食指大动，也为中国的豆腐文化赞叹。又如他写酱菜，酱菜是以新鲜蔬菜为原料，经食盐腌渍成咸坯后，使用压榨方法把水分及盐分拔淡，再经不同酱品腌渍后的酱菜成品<sup>208</sup>。汪曾祺把中国南北地区典型的酱菜材料、古代文人作品中描写过的咸菜及海外酱菜的类型都一一描写。随后把“文化小说”与酱菜的腌制步

---

<sup>206</sup> 王一川，〈第七章 审美文化 四、民间文化〉，《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页 163-164。

<sup>207</sup> 宣炳善，〈序〉，《民间饮食习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页 3。

<sup>208</sup> 索良敏、席荣华、李彦杰，〈第一部分 酱腌菜的基本常识〉，《腌菜·酱菜·泡菜》（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页 2。

骤联系在一起解释，指出小说里掺着民族特色也算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想要展示厚重的历史感与民族韵味就要像酱菜一样在民族文化里进行有方法、适时的浸染，但也要注意把握度，一味夸大营造吹捧则会适得其反。既说了民间酱菜历史，又说了文学问题，一语双关。

汪曾祺在饮食散文中传达了要尊重不同饮食文化的观点。〈四方食事·口味〉一文里他提到在饮食选择上，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会有差异，也有不少令人诧异的食物，如广东人吃蛇，吃龙虱；傣族人爱吃苦肠，即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失的粪汁，蘸肉吃<sup>209</sup>，这些食物看似猎奇，但存在即合理，你可以不喜欢，不代表别人吃就是错误的。文化同理，我们要理解与允许不同文化的存在，正是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多样性。

汪曾祺的饮食散文还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观照。他写昆明一家茶馆里忙里忙外招揽生意的女人，要照顾孩子还要为客人加茶，而他的丈夫身强力壮却什么事也不做<sup>210</sup>，一个妇人撑起一个家，除了褒赞妇女对家庭的无私奉献外也夹杂对妇女的同情，同时还对存在了数千年的父权社会发出了质疑。中国西部地区存在一种工人——脚夫，他写脚夫们吃饭，食物捆在腰间，多是红米干饭就盐和辣椒面，多了再加一些咸菜丁<sup>211</sup>。看劳动人大口酣畅吃饭本来是一件快事，但这些脚夫进食如黄牛反刍一般让人丧失胃口，麻木地吞咽，他们让人感受不到活力，只有无尽的沉默与混沌，他因此称呼脚夫为“背东西的兽物”。卖茶妇女与脚夫是一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底层人民的缩影，汪曾祺表达了对他们精神与生活状态的担忧。他想要借饮食去引起人们对这些下层百姓生活与命运的关注。这是一种人文主义关怀，也说明汪曾祺是真的

---

<sup>209</sup> 汪曾祺，〈四方食事·口味〉，页5。

<sup>210</sup> 汪曾祺，〈泡茶馆〉，页113。

<sup>211</sup> 汪曾祺，〈背东西的兽物〉，《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71。

俯下身子去观察、去接触了民间饮食文化，民间饮食文化除了悠远璀璨的人文历史外，也有值得我们倾注更多关怀与寻求解决的部分。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传统文化中随处可见对于土地、食物的颂赞，汪曾祺的文人气质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与民间文化有着亲切感，他用温情、包容的目光去审视日常生活的动人之处，用一种民间视角对传统饮食文化进行定义与改写，把原本不起眼的民间饮食文化中寓含的理趣重新改造呈现到世人面前，使人眼前一亮，原来简单的食物背后还存在这样悠久的文化底蕴。同时他也借民间饮食去关注了一部分弱势群体的生活方式，寄托了人道主义与仁爱精神。汪曾祺的饮食书写表现了一种“地气”，他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去了解民间饮食文化，这是一种文人理想的体现。

## 第五章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书写异同的原因

每一个完整文学作品的呈现，背后都有促使其形成的因素。它是作家书写时心理活动与思维的凝缩，是作家人生轨迹与生活体验的渗透，是作家对待事物的情感态度与时代价值要求的折射，更是作家个人文化涵养与内在气质的展现。林语堂与汪曾祺的饮食散文之所以存在异同，是他们各自家庭环境、文学追求、教育背景等多方作用下造就的结果。

### 第一节 和谐家庭氛围的浸染

研究文学作品时从创作者家庭背景及童年经历着手是常见的切入角度，家庭是一个婴孩从拥有生命那一刻起的庇佑院，是成长的生活单元与重要场所，对人一生的发展会产生关键作用。同样的，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作家的情感思维与文学活动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林语堂与汪曾祺都拥有温暖的家庭，二人在爱里成长，他们的家庭氛围是和谐的，童年的生活是美好的。

在林语堂看来，他所获得的造诣与他的原生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直言：“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最为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sup>212</sup>，“一个小孩子需要家庭的爱，而我有的很多很多，我深识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兄弟的爱和姐妹的爱。”<sup>213</sup>家是林语堂灵魂的初始船埠，是承载美好回忆的时光器皿。

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对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乐观主义精神的培养与中西结合式的启蒙教育。林父年少时便为家中生计而奔波，但他并不为生活的苦而悲观，也不为家贫而自卑，任何时候都怀揣平和之心，这种乐天的特质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林语堂。因

---

<sup>212</sup>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 少之时〉，页4。

<sup>213</sup>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 少之时〉，页5。

为是基督教牧师的缘故，林至诚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与教育，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也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林语堂评价林父：“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有想象力……”<sup>214</sup>，一个出身清寒的山村牧师下定决心让孩子们去国外留学接受西方教育，在很多人看来是白日做梦一般的不切实际。但就是林父这样的“空想”，帮助并促使林语堂不断地朝着目标迈进，直至最终实现。这种鼓励式的“空想”，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林语堂通向未来的大门，打通了他求学的梦想之路。1921年林语堂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依然决定去德国求学，也可以说是其父乐观主义精神的一个承继与再现。林至诚虽然是牧师，却也爱好中国儒道文化。在林语堂的孩提时代，父亲为他们讲授更多的是诸如诗经、四书一类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家中的儿女每日清晨还要诵背古诗词，所以林语堂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的依恋在儿时便已扎根。除此之外，林父也鼓励孩子们学习英文、翻看外国文学作品，这种中西结合的启蒙教育使得林语堂身上和谐地交织着东西方两种文明。

林语堂的母亲杨顺命对林语堂的影响是悲悯之心的培养。林母是一个淳朴、仁慈的乡村女人。对人友善平等，“她常常同农人和樵夫们极开心地谈话”<sup>215</sup>，不论乡邻贫富都一视同仁，从不攀高踩低。无事便与林父招待贫苦的村民来家用饭喝茶，德行与品质多被人称赞。林母这种对人对物常怀怜悯之心的思想后来在林语堂的一些饮食散文中也有所体现。林母对孩子们也是耐心十足，从不呵斥贬低，养育九个子女的重担常使她疲累，但其从不抱怨，一如既往地给予儿女们源源不断的包容与关怀。生产林语堂时林父重病，林母独自一人给自己接生，坚强又伟大。在杨顺命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母亲形象的缩影，她们良善、勤劳、大爱无私。

---

<sup>214</sup>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林语堂自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40。

<sup>215</sup>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 第二章 乡村的基督教〉，《林语堂自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9。



在林家，即使是孩童，也要“各司其职”，男孩子们打扫卫生清理庭院，女孩子们举炊洗衣，这样的分工使得林语堂从小便懂得了“自立”与“责任”这两个词的意义。兄弟姊妹间的感情是林语堂终生难以忘怀的。林语堂与二姐林美宫感情很好。林美宫聪颖好学，极富才情，喜欢读各种西方文学，后来因家庭经济原因不得不终止学业选择嫁人，嫁人前将仅有的四角银钱交付给林语堂，嘱咐他珍惜学习机会好好念书。这个场景与那些鼓励的话语如石刻一般永久刻入了林语堂的脑海。林语堂兄弟间的相处也是极其和睦的，林语堂去上海读书时其二哥也心甘情愿补助林语堂的学费，可见兄友弟恭。他的家庭里每个人相处遵循的都是平等的态度，这种态度最终相应的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

文学史上称汪曾祺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与他的家庭有一定的关系。汪曾祺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无论是家中长辈，还是建筑、礼节习俗都显现着一种旧派文化气息。这种家庭氛围在无形中影响了汪曾祺的喜好与文学性格。

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当属其父汪菊生。汪父对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美意识的初建、人道主义的教育、自由自主性情的培养三方面。1992年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汪曾祺还在回忆里写道：“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sup>216</sup>朴实的字句里足可见汪曾祺对父亲的敬重与怀念。汪父多才多艺且颖悟巧思。除了会作画、刻图章外，各类运动和手工也都非常擅长，荷花灯、西瓜灯以及好看的风筝都是汪父赠予汪曾祺童年的斑斓色彩。不光能侍养动植物还能做得一手好菜，把生活过得趣味十足又闲适雅致，这些种种琐碎拼凑了一个真实的汪父，父亲的全知全能使汪曾祺早期的审美意识得到了构建。汪父是个善良、有着侠义精神的人。汪曾祺曾记录其与父亲路遇侦缉队敲诈乘客财帛的经历，历来文雅的汪父出手相助。汪父会医眼疾，会配药，

---

<sup>216</sup> 汪曾祺，〈我的父亲〉，页 67。

常做一些济世利人的义举，汪曾祺作品里的有一位主人公王淡人，便是以汪父运送赈灾会食物一事为原型创作的。汪菊生的“仁心”与“悯人”情怀感染了汪曾祺，使得他将“人道”看得很重，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处处可寻见对“人”的关怀与体恤。

汪父是儒雅与博学的。他的教育观念是“尊重孩子主体性”。在汪曾祺的成长过程里，父亲对于他的学习始终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势，汪曾祺喜欢什么，汪父从不干预指点，任他自由发挥给足空间。汪曾祺儿时爱唱戏，汪父就拉琴为其伴奏；汪谈恋爱，其父一旁出主意；汪曾祺再大一些，汪父抽烟喝酒也会许他一份，汪菊生自己也道：“我们是父子多年成兄弟。”<sup>217</sup>这样的父子关系即使我们现在看来也是啧啧叹奇的。可看出他们的父子情不是传统意义上一味服从与被屈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等的、彼此尊重的亲情。这种尊重使得汪曾祺做人做文章讲究独立自主，不喜规则拘束。

汪曾祺的祖父名为汪嘉勋，曾获清朝的“拔贡”功名，文采非凡。在汪曾祺幼时便教其读《论语》，指导其练字与修习八股文，这奠定了汪曾祺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写作基础。祖父闯劲十足又乐善好施，赤手空拳打拼出一番产业，做生意讲求信誉，不光店里的药材货真价实，还免费为乡民医治眼睛。祖父饱受孔孟洗礼又不失浪漫，喜饮酒，酒后要高声诵诗。这些真性情的特质后来或多或少也有在汪曾祺身上得到体现。汪曾祺的祖母出身于书香门第，勤劳务实且厨艺高超。祖母会自己做酱油，做鱼圆，祭祖的所有大小事务皆由其一手包揽，端午包粽，中秋洗藕。糟鱼烧肉、腌咸蛋、腌青菜、花生酥、香蕈饺子等都是汪曾祺记忆中祖母的拿手好菜。祖母的手艺里潜藏着满满当当对生活的热爱，这种无言的热爱感染着汪曾祺，使他对饮食有着莫大的兴致，创造出大量优秀的饮食文学作品。祖母还会在晚上给汪曾祺讲故事，那些简

---

<sup>217</sup> 汪曾祺，〈我的父亲〉，页 91。

短故事里展现的真善美道理也塑造了汪曾祺的人格。汪曾祺的家庭里充斥着古典文化的情调与安宁祥和的气氛。

林语堂与汪曾祺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童年经验是指人们在童年时期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它往往影响人的观念、情感基调和行为方式等的形成，对一个人的人格及生活产生重要的作用”<sup>218</sup>，二人的艺术个性在孩童时期便得到了正向发展，这为他们之后的文学之路铺设好了坚实的路基。“艺术家的童年经验，往往决定艺术家一生的艺术方向……给具有艺术天资的儿童灌注了‘自我肯定的力量’”<sup>219</sup>，在爱中成长的孩子是自信的，美满的家庭与快乐的童年经历使得他们的文字流露出来的态度是乐观达天的，窥见的也都是幽默闲适，不见忧虑苦闷。即使身处困境，也透着一股随遇而安、静待花开的立场。

---

<sup>218</sup> 吕智敏，〈作家的童年经验〉，《文艺学新概念辞典》（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页 268。

<sup>219</sup> 李璞珉，〈第三节 艺术才能的形成与发展〉，《心理学与艺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页 222。

## 第二节 心驰自然的文学根植

文学之所以富有生命力，是因为文学的背后潜藏着创作者对世界的领悟与价值决断、编写过程中掺杂的情感与心绪以及对社会某些现象、某些局面的褒贬与指摘。这些要素也可称文学根植，它们通过文字的形式传递思想与力量，然后与读者形成共鸣，引起重视与讨论。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林语堂与汪曾祺的创作在文学根植层面都心驰自然，对自然的热爱使得他们观照到世界与生命的美妙，自然陶冶了他们的艺术性情，塑造了他们淡泊的品格。

中国古代以来就有“天地人和”的观念，所谓“天地人和”，就是说人与自然间的所有存在都是共生的、相互凭靠的，只有和谐、顺应方能达到圆满的境界。这种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林语堂与汪曾祺也不例外。对自然的神驰与向往不单只是影响了他们的性情，对他们饮食散文的审美与风格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林语堂出生在福建一个名为坂仔的山村，虽然地处偏僻，但那里连绵不断的高山、秀丽挺拔的青植、盘曲澄清的流水、碧野无际的禾田是林语堂无法忘却的故乡记忆。由于地势的原因，他居住的地方常年笼罩在云雾交织中，年幼的林语堂常望着天空产生无限遐想，那些对于人生与未来的好奇在坂仔便已生根。

他爱着那片土地，也曾多次撰文表示家乡的高山塑造了他内在的个性，“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sup>220</sup>高山的巍峨是直通天际的，不管风云再如何变幻，宽大的高山始终如沉默的战士一般撑起一方天地，从容面对千百年的磨难与衍变。这种“高山观”培养了林语堂豁达大度的胸襟，家乡的山水滋润了他的性灵。在林语堂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一脉祥和的，能够建立起对自然的惊奇

---

<sup>220</sup>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 少之时〉，页5。

感与亲密感才能够创作出好的文章，所以他写道：“故行文首需养生，饲鹅种菊，观云赏月，心地轻松”<sup>221</sup>，他的文学书写中流露着对大自然的亲厚与享受生活的乐天知命。

汪曾祺是在江苏高邮地区成长起来的，高邮是一个被水包围环绕的城市，高邮的水细腻平和，水流缓缓而过润泽了当地的江南儿女。高邮文化氛围浓烈，是词人秦观的故里，千年余韵滋养了汪曾祺多情与秀雅的气质，风光景致培养了他对自然美的追求与探索。

汪曾祺是喜爱大自然的，这种喜爱是纯粹的、不带功利性的，只讲求灵魂深处最真挚的愉悦。在他的眼中，自然界万物平等，再微小的东西也是值得写一写的。草有巴根草、虎耳草、狗尾草、龙爪槐，虫有天牛、蟋蟀、蝉、蜻蜓、土蜂，蔬菜有蕹、秋葵，水果有葡萄、香瓜，春天的杨柳、夏天的栀子花、秋天的桂花、冬天的腊梅花等。所以那些再普通不过的饮食在他的笔下也皆有可写之处。在汪曾祺的书写中，它们不是了无生气的纸质剖面，而是一个个各具特色、立体而鲜活的形象。

虽然林语堂与汪曾祺二人，一个是闽南高山观，一个是江南水乡魂。但他们二人共有的都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对众生万物的关怀与重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很容易与自然形成共鸣，因而注重自己性情的培养，他们把自己的感情寄托于山水风光之间，被自然景致吸引的过程中，崇尚自由的开阔心境便应运而生，对自然的热爱与尊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二人叙述情趣，即“性灵”与“闲适”观的形成。若忽视了自然在当中发挥的作用，那便很难从根源上去分析他们的饮食创作。

---

<sup>221</sup> 沈家宝编，〈国文讲话〉，《林语堂批评文集》（广东：珠海出版社，1998），页41。

### 第三节 中西结合式教育与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

探究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书写的异同，除了考虑到二人相似的家庭背景、文学根植外，还要对他们不同的求学经历进行探究。这种特有的、阶段性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的文字中融会了求学之地的风土人情，文学思考中保留了各自接受的教育类型的痕迹。

说起林语堂，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其“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学标签，这与其所受过的教育有关。西方的基督教精神贯穿了林语堂的一生，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习经历使林语堂能够以独特的视角去审视中西文化的碰撞，但他的骨子里对中国文化又有天生的赤诚与兴趣，丢不下也抛不开。

林语堂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周围围绕的人事也多与基督教有关。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曾回忆一位中文名字为林乐知的外国传教士，其编写的一本介绍西方文明的周刊开阔了他们全家人的视野，“说来也许难以叫人相信，在那样偏僻的小乡村中，而且是当慈禧太后还统治着中国的时候，我父亲却告诉我关于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了”<sup>222</sup>，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具有超前性的。林语堂入读的学校，从坂仔的铭新小学、鼓浪屿的教会小学、厦门浔源书院的中学一直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他的教育模式从头至尾都是基督教教会教育。17岁的林语堂遵从父命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初进大学校园时他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牧师，也加入了学校的神学院，但后因教条的刻板选择退出神学院。入读的大学重英文教育而轻汉文，开设的中文课程也枯燥无味，逐渐激起了林语堂心中想要研读中国文化的火苗。

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林语堂，教会学校教予他的知识在这座被他称为“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真相”的城市中并没有展现出优势，反而让他产生身为中国人对中国

---

<sup>222</sup> 林语堂，〈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林语堂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页67。

传统民间文化知识匮乏的羞愧。发出了“任何中国的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识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sup>223</sup>”、“对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来说，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中国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期望”<sup>224</sup>的慨叹，随即毫不犹豫地投进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洪流里。其欣喜地吸收中国传统儒释道等文化，并创作了大量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作品。但基督教会赋予他的知识基础并不是消亡了，而是已经渗透进其文学思维中，在他的文字里随处可见被西方文化影响的方面。

林语堂所接受的基督教会式教育与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钻研共同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这两种看似不兼容、矛盾的意识形态在林语堂身上却出奇的和谐。基督教的教育使得林语堂能够接受西方先进文化与思想，并以理性视角去观看很多事物。西方基督文化使得林语堂认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人格才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因而林语堂没有禁锢在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意识里，他主张“享受生活的休闲文学”在现代文坛独树一帜。中国的文化对林语堂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些在他的性灵、闲适、幽默等观点上有所展现，更体现在他能够和谐处理自己思想上的双层文化。

汪曾祺作品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老派中国传统文化审美与情致，这与他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其中以西南联合大学就读的经历对其创作影响最大。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西南联大，虽然在历史上仅仅存在了8年，却为中国文学培养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人才，汪曾祺就是其中之一。汪曾祺书写昆明和西南联大的作品数量在其创作总数中占到了很大的比重，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对母校西南联大的热爱与敬仰，对于汪曾祺来说，西南联大是他作家之路的伊始指导所在，“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

---

<sup>223</sup>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林语堂自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50。

<sup>224</sup>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页54。

个作家——不是另外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sup>225</sup>，西南联大赋予了汪曾祺精彩的艺术生命。

西南联大开明自由的学术精神影响了汪曾祺。联大的中文系更是将“自由”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其他系的作业严格要求，而中文系“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sup>226</sup>，联大的学习模式给予了学生一定的自我想象与创造空间，没有压迫感的学习节奏让汪曾祺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适合自己的文学创作类型。除了学习方面的“自由”，西南联大在文学派别与学术氛围上也同样遵循这一原则，联大最主要的文学派别是“京派”，但老师们并没有只宣讲“京派”，“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sup>227</sup>，不同的文学派别相关作家作品也都会拿出来讲与学生听。汪曾祺认为联大的民主思想在精神层面赋予了学生们“如云如水，水流云在”<sup>228</sup>的气质，正是这种包容自由的学术氛围塑造了汪曾祺和谐、任意流淌的文学风格。

汪曾祺就读时的西南联大拥有一批在中国堪称大师级别的教师团体。“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sup>229</sup>，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卞之琳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在联大任职。对汪曾祺来说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教导汪曾祺叙述语言要紧挨着人物、朴素方显本真的写作原则，汪曾祺的作品便取材于最普通不过的生活与小人物，去探索那当中蕴含的日常美；沈从文先生认为创作要摆脱商业与政治的影响，汪曾祺便将创作视野对准“世道人心”与“人间琐细”；沈从文先生在文体研究方面颇有造诣，汪曾祺的

---

<sup>225</sup> 汪曾祺，〈七载云烟〉，《随遇而安：汪曾祺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页173。

<sup>226</sup> 汪曾祺，〈七载云烟〉，页176。

<sup>227</sup> 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全集5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页113。

<sup>228</sup> 汪曾祺，〈七载云烟〉，页183。

<sup>229</sup> 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页112。



文学创作也是在各种文体间来去自如，敢于打破它们之间的界限；汪曾祺承继了沈从文的“京派”风格，联大其他教师的学术指导，也让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理解与研究。

西南联大成就了汪曾祺。联大的七年美好经历为汪曾祺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联大开明自由的学术精神与学术氛围培养了汪曾祺诗性、质朴的文学性格。

综上，林语堂与汪曾祺二人的教育背景，一个是西方基督教会教育与中国文化的混合，一个是中国高校本土文化教育，不同的求学经历致使二人在文学思维、人生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不同，这些差异也相应地体现到他们的饮食散文书写中。但他们也都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割舍不掉的眷恋与喜爱，这也是他们的饮食散文作品在某些特质上有重叠的原因。

## 第六章 结语

林语堂与汪曾祺是“闲适”类型文学的代表作家，饮食散文是二人休闲风格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创作题材上，他们饮食散文的共同点是对故乡与怀旧饮食的书写。根据林语堂语汪曾祺创作的时间线来看，这些思乡怀旧的饮食散文大都创作于二者的中老年时期，人到暮年生活节奏的舒缓不免让他们忆起过去的岁月。根据法国莫里斯·哈布瓦赫“过去记忆重建”的理解，青年人要专心现在的生活，于是他们迫使自己的童年记忆发生改变以适应现实，而对于老年人，“他们所处的位置最适宜唤起对过去事情的回忆”<sup>230</sup>。他们借助这些食物回到时间维度上那些蛰伏的时光中，再度重感各种旧日情意，也凭此再重游空间维度上返不回的家乡以及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城市体味风土。

对家乡的热爱及对旧日时光的怀念使得林语堂与汪曾祺将家乡美食、旅居地的美食作为他们饮食书写的题材，他们在饮食散文中讴歌着亲情、师生情等真挚的情谊，缅怀着过往的温情岁月，他们用饮食观照人生、观照社会。当然，有同即有不同，林语堂的人生哲学是及时行乐，是希望人人都能过上一种坦然舒心的生活，这种坦然舒心是一种幸福感，是一种情感体验，只有正视自己的真实欲求，发自真诚的亲近自己的情感才能享受生活，成为生活的主人。汪曾祺则用一种淡然释怀的态度触碰饮食搭建的人间万象，他想要呈现的是对生存状态的追问，在平淡的生活中去寻找闪光点，去观照美，去挖掘诗意，把生命里的苦难化为向前推进的动力，展现生命的韧劲与坚强，这是一种苦中作乐的人生哲学。

---

<sup>230</sup>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三、过去的重建〉，《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83。

关于艺术笔调，由于他们都受到中国古典艺术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叙述情趣上都表现出了“性灵”与“闲适”特点，汪曾祺对于林语堂“性灵”、“闲适”的承袭，不是全盘照收，他在林语堂提倡表现自我的基础上又将这一观点发散、最终把叙述情调升华至文娱与审美层面，最后呈现给我们汪曾祺式的悠闲饮食书写。二者语言风格前者恣肆通俗，妙趣横生。后者朴素简洁，韵味十足。

在文化意蕴方面，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饮食文学创作上进行细致考据，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中的知识考据，一方面将叙述变得更加具有生活气息，另一方面为文章增添了文化趣味与文化内涵，读者在感受古往今来饮食文化变化的同时，阅读视野也更加开阔。这些知识考据体现了二人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与可贵的求知精神。不同处是林语堂对中西饮食文化进行了对比思考，表达了对正向的中国饮食文化的赞同，而汪曾祺则立足于中国民间饮食文化，扩展了对民间文化认识的渠道，并在其中传达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把中国民间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及背后芸芸众生相呈与世人体悟。

他们的饮食书写有相同也有不同，这来源于他们的家庭背景、文学信仰和他们不同的求学历程。他们家庭背景上的共同点是和谐家庭氛围的浸染、心驰自然的文学根植，求学历程上的不同处是林语堂接受了中西方双重教育，汪曾祺是传统中国教育、师从西南联大沈从文。他们的饮食散文，一个妙语连珠、幽默哲思；一个平和温润、质朴剔透。共同丰富了饮食文学书写的文化研究成果。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的出现，是对现当代散文题材的一次补充与拓展。本研究在前文中已对林语堂与汪曾祺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学大形势进行了分析，1930年代林语堂从革命文学的激流中挣脱，选择了闲适小品文创作，他主张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将文学与政治标准区分开。他的闲适小品文开启了另一种悠闲、休闲的文学风

格，而饮食散文正是构成其闲适小品文的重要一部分。新时期之处，林语堂的闲适书写得到了“正名”，汪曾祺认同林语堂“性灵”与“闲适”的理念，在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盛行的期间也是选择了将视角对准饮食，专注践行“闲适饮食”散文书写，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关注到以饮食为主题的散文并投入到相关创作之中，他们二人的饮食散文创作，丰富了现当代散文的题材，对推动饮食散文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具有超前的时代内涵。二者的饮食散文写饮食却不止于饮食，反映了他们从心、从乐、休闲、旷达的人生理念，这是对传统批判“享乐主义”文学观念的一种反抗，体现出超前的时代意义。张颐武曾言，“闲适话语”是“‘现代性’话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sup>231</sup>，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节奏加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会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繁重的压力，这时候带有休闲性质的饮食散文就恰好可以发挥它缓解疲惫与焦虑的文学功用，时代的发展需要这一类闲适文学，汪曾祺与林语堂倡导的饮食散文顺应了大众审美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要求，具有超前性与进步意义。

林语堂与汪曾祺饮食散文，对中华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民以食为天，每一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存在自己特有的饮食文化，林语堂与汪曾祺的饮食散文打破地域界限，将故土、不同的旅居城市、祖国各处的美食风味都串联起来，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底蕴，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有利于中国饮食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更好地交流。

---

<sup>231</sup> 张颐武，〈闲适文化潮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页2-5。

## 参考文献

### 一 专著书籍

1. 陈苏华, 《人类饮食文化学》(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8)。
2. 方维规, 《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 [德] 歌德等著、王元化译, 《文学风格论》(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4. 高志明, 《通感研究》(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5. [元] 韩奕著、邱庞同注释, 《易牙遗意》,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
6. 黄万华, 《中国现当代文学》(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7. 林语堂, 《林语堂自传》(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0)。
8. 林语堂, 《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 第三卷》(北京: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7)。
9. 刘雨, 《艺术经验论》(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0. 林语堂, 《大城北京》(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
11. 林语堂, 《爱与讽刺》(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0)。
12. 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13. 林语堂, 《林语堂随笔精选》(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14. 林语堂, 《生活的艺术》(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3)。
15. 林语堂, 《人生当如是》(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3)。
16. 林语堂, 《林语堂自述》(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17. 林语堂, 《我站在自由这一边》(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3)。
18. 吕智敏, 《文艺学新概念辞典》(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19. 李璞珉, 《心理学与艺术》(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20.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 《论集体记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1. 欧阳俊, 《现代小品理论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22. [宋] 浦江吴氏、陈达叟, 《吴氏中馈录》(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7)
23. 庞天佑, 《考据学研究》(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4)。
24. 索良敏、席荣华、李彦杰, 《腌菜·酱菜·泡菜》(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25. 沈家宝编, 《林语堂批评文集》(广东: 珠海出版社, 1998)。
26. 童炜, 《文学风格论》(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7. 唐弢, 《文章修养》(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8. 王明居, 《文学风格论》(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0)。
29. 王学泰, 《华夏饮食文化》(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30. 王光祖、杨荫浒，《写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10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2.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精选：有味清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3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6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4. 汪曾祺，《故乡的食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35.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5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6. 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37.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9 谈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8.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12 书信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9. 王一川，《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0.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4 散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41. 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42. 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43. 伊壁鸠鲁、卢克来修著、包利民等译，《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4. [清]朱彝尊，《食宪鸿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5.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 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6. 钟怡雯，《雄辩风景：当代散文论 I》（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47.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8. 庄涛，《写作大辞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 二 期刊论文

1. 卞永清，〈平民化的汪曾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期。

2. 陈秀珍，〈寓庄于谐独具闲趣——林语堂散文的幽默〉，《武夷学院学报》2010年6期。

3. 陈国恩，〈文学社会学视角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02期。

4. 杜江晖，〈林语堂散文幽默观初探〉，《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5期。

5. 高慧雯，〈论传统饮食文化与汪曾祺散文的关联〉，《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6月第18卷第2期。

6. 郜积意，〈当代社会学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河北学刊》1995年4期。

7. 贺美锋，〈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散文特点比较〉，《青年文学家》2013年4期。

8. 黄科安，〈“边缘化”与闲适之文——论汪曾祺散文的审美艺术〉，《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3期。



9. 贾晓珉，〈丰子恺散文中的饮食文化探析〉，《长江丛刊》2016年12期。
10. 蒋含璐、陈佳佳，〈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文化解读〉《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11. 柯玲，〈汪曾祺特色的文化性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2期。
12. 雷琰、范厚权，〈浪漫与古典——林语堂、梁实秋文艺观之比较〉，《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4期。
13. 鲁晓霞，〈汪曾祺散文的艺术个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期。
14. 苏静、赵苗，〈试论林语堂散文的当代文化价值〉，《文教资料》2017年27期。
15. 王丽君，袁勇麟，〈海洋文化的记忆场域：夏曼·蓝波安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21年12月第12期。
16. 王梦石，〈当代茶散文创作谈〉，《农业考古》2008年02期。
17. 吴周文、张王飞，〈汪曾祺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江苏社会学科》2014年2期。
18. 王艳蕾，〈昭显生活 随性灵动——汪曾祺散文创作论〉，《湖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
19. 于祎，〈“馋”：饮食散文随笔中的北京文化之真性情〉，《大众文艺》2016年24期。
20. 余思亮，〈激发文字里的味蕾：澳门美食散文的身份认同与乡土情结〉，《新阅读》2020年11期4。

21. 张宇菊，〈论林语堂散文的幽默风格〉，《青春岁月》2017年26期。
22. 张洁，〈另一种角度的思辨——林语堂散文解读〉，《镇江高专学报》2012年3期。
23. 朱希祥，〈“橘子”、“扬州菜”及其它——朱自清散文中的饮食文化〉，《食品与生活》1999年02期。
24. 朱希祥，〈食品——人生意义的表现与折射——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上）〉，《食品与生活》1997年第1期。
25. 朱希祥，〈中西比较：自然——文化——政治——林语堂散文中的饮食文化（下）〉，《食品与生活》1997年第2期。
26. 郑晓玲，〈论儒道精神对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影响〉，《大众文艺》2019年7期，页42。
27. 周荷初，〈汪曾祺散文创作管窥〉，《当代文坛》1993年4期，页28-30。
28. 张雨凡，〈饮食与人生的深层互动——评汪曾祺饮食散文〉，《新纪实》2021年第33期。
29. 张颐武，〈闲适文化潮流批判——从周作人到贾平凹〉，《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30. 张颐武，〈闲适文化潮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 三 学位论文

1. 陈思，《汪曾祺饮食散文研究》，（中国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论文，2017），页I。

2. 李友云, 《饮饌之美——二十世纪中国饮食文学研究》(杭州: 浙江大学美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年), 页 III—10。
3. 潘秀芹, 《沈从文、汪曾祺散文比较研究》, (中国山东: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页 1。
4. 于帆, 《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年), 页 I。
5. 游丽云, 《怎样情色? 如何文学? 台湾饮食文学中的情色话语》(台湾: 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2008), 页 1。
6. 郑淑娟, 《台湾饮食散文研究》(台北: 私立佛光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2007), 页 11。
7. 钟瑾, 《论沈宏非散文的饮食书写》(广西: 南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年), 页 I—II。
8. 江浩, 《饮食文学范畴的建构: 一个社会学式的考察》(台湾: 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2009), 页 96。
9. 倪阳, 《继承与重构: 论鲁迅作品中的酒》(安徽: 安徽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2016)。